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九月四日 ·每份一角五分·

第五卷 第二期

專論

論政府大捕學生 趙超構

從幾個世運選手拒絕回國說起 潘光旦

特稿連載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張東蓀

美國通信

「紅帽子」在美國 段連城

外論選譯

文明在生死之間 Arnold Toynbee

哀思

最完整的人格 李廣田

紀錄

燕京被搜在場談話 陸志韋

觀察通信

北平大拘捕（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南京大拘捕（南京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關中搶糧戰（西安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鄧錫侯遲不赴任的原因（成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何其芳的轉變 沈宗徽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一)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illegible]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平寄：一元八角　掛號：一元九角　航平：二元六角　航掛：二元七角

六個月——平寄：三元六角　掛號：三元八角　航平：五元二角　航掛：五元四角

香港澳門：半年平寄港幣八元·航平港幣十二元

國外：半年美金二元

郵資匯價·酌扣寄刊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第四卷上冊 有售
第四卷下冊 裝訂中

售價：每冊二元　掛號每冊四分　航掛每冊七角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一百五十元

普通——全面：一百四十元　半面：八十元　⅓面：五十五元　¼面：四十五元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二分　掛退：附郵五分　航退：附郵一角　航掛退：附郵一角五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警察與法律

編者先生：最近有兩件事情牽涉到法治問題，事情雖小，涵義甚大。

第一件是南京人報載某總司令的公子駕車撞破警察崗亭。警察向前警告他說：「如此開車是危險的，壓死人怎麼辦？」總司令公子回答：「就壓死你也不算回事。」結果警察不知其為誰人，將總司令、夫人、公子、汽車，一併帶局，但結果反到受了警廳的處分。而且廳長黃珍吾親自道歉，總司令方纔離所回家。消息發表後，警廳責備該主管警所所長查明何以洩漏的原因，該所長坐在人報館非要知道來源不可。黃珍吾且在警校紀念週希望警員執行職務要分辨對方身份，這件事如果眞是如報上所說那樣一般無二，實在是有辱警察使命，違反法治的精神，助長惡勢力的威風。第一，駕車不愼，就該處分，撞破崗亭就該賠償，無執照駕車，不免有草菅人命之嫌。總司令的公子與平民應同受法律的管制，不能因身份而扭曲法律。警察是代表國家執行法紀，維持社會公共的秩序。該公子竟然認為壓死崗警亦無所謂，如此藐視執行國家秩序的代表，實屬目無法紀。總司令既然在場，理應管束他的兒子，遵守法律。另一方面說，警員如果出言不遜，自應受出言不遜的責罰，但絕不能因警員的應對不當，而抹殺其公子駕車不愼的錯誤。黃廳長出面道歉，也許是為警員言語冒犯總司令而道歉，但對他主管職責所在的違警事件，亦應堅決處理，何以竟毫無下文？而且還要嚴守祕密！如此下去，一個國家的警察制度，如何能夠健全？照這樣做法，人民之間分了高下，特殊階級可以違警而無所謂，人民如何能夠心悅誠服？所以事情雖小，影響實大。我們的監察機構，對於這種事件，正應查他一個水落石出。如果是報導錯誤，亦應讓人民知道，以免誤會。如果這報導正確，更應追究各人應負的責任，分別依法治理。

第二件是報載漢口的風化事件。報上說當警察行抵該樓時，外籍人士執鎗拒絕現場拍照，警察人數過少，卻未拍照。如果眞是這樣，又是一件有辱警察使命，有辱國體的大事。持鎗拒捕，根本犯法，警員就該勒令繳械才對，何能因人寡不敵，就此算了？警察為了維護治安執行法律付予的責任，應存國家至上，責任至上的決心。而這種持鎗威脅警士的人，無論古今中外，均是格殺勿論的。漢口警察竟然輕輕放過，其中一部份原因據說是若干太太請求的結果。這種罪犯乃屬刑事範圍，警廳是無權放縱，而必須予以逮捕的。而且推事可以提起公訴，目下中國已無治外法權存在，外國公民在中國應受我國法律制裁。革了幾十年的命，好容易取消了不平等條約，而輕輕地就被警察送還了，未免有些荒謬。這事的影響也很大，牽涉到警政與治外的權益問題，損了國家的體面與主權，如何能輕輕放過？一般人似都注視着外僑的驕橫，忽略了自己執法者的懦弱，而不加予責備，也許是怕萬一引起外交問題，又要受上峯的處分；也許是國際知識不夠，看見洋大人先短了半截。總而言之警察當局到場時的處置是有損警察職責的。

丁芸　八月廿二日　南京

秋風！

編者先生：在這秋風送爽的日子裏，北平，這坐「文化」古城，又發生了空前的逮捕「匪諜學生」的事件，一次兩次的黑名單，接二連三的包圍、傳訊、拘押和通緝，把一座像靜水似的古城，攪得波瀾萬丈，人人自危、政府好像是要和整個的青年們為敵似的，不惜任何手段加以迫害，大有非斬盡殺絕不休之勢。而外面所得到的消息，又都是清一色官方報導，要想從重重包圍裏透出一點眞實的消息，是很困難的。下面是一封僥倖漏網的信，由清華園寄到北平城內的。這個寫信者是一個機械系的學生，平日很少參加各種活動，對於政治問題也很少興趣，所以他的話我覺得是能代表這些沒有色彩，沒有背景的同學們的情緒的。

為了使社會人士對這次事件有一個正確的看法，我想只有把這封信寄給擁有廣大讀者且敢言的「觀察」。現在抄錄如下，希望先生把牠披露出來：

GM　八月二十四日　北平

GM：……沒有告別，沒有達到常去你家度週末的計劃，我就回清華園來了。到校時園外軍警很多，再三交涉、檢查，才放我進學校。進得園來，好像一切都變了，每個同學都緊張得要死。黑名單是一次一次的公佈，聽說還有「不公佈」的名單，隨時可抓，生命安全都失了保障所以同學們人人自危。再加上門禁森嚴、買菜、吃飯，都成了問題。教授家就有好幾天沒能買菜的，清華園成了恐怖世界。

校牆外軍警重重，圍得水洩不通，隨時都可以衝進來逮捕搜查。校門、校牆，一點尊嚴也沒有了！聽老朱說，日本人進清華園時也沒有這麼偉大的場面！錢先生夫婦深夜伴着我們的糾察隊在西院道上巡邏、精神眞值得佩服。院牆外就是軍警，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監視着。這樣壓迫，本來大部份同學這兩個月以來都厭倦活動，不是上圖書館看看書，就是在宿舍裏下下棋，聊聊天，再不就是游水打球。當局卻以為是好時機到了，跑來大捕「匪諜」，重新把全部學生激動了起來。現在連平日最中立，對外事不聞不問的同學，也都不得不為維護同學和自己的安全而行動起來了！許多平日只閉門讀本，想在將來建設的時候做一個小螺絲釘的，也都動了起來；當然，是現實殘酷教訓了他們，在工廠基地還在打仗的時候，螺絲釘是沒用的。

至於那些名單上的人物，有的是畢了業離校他去了的，有的是已經走了的，一般「左傾」份子，早就跑了，剩下來多半是一些理事會的理事們，平日搞搞福利，是幾個「知名之士」，就讓特務們抄上名單報了賬。其實他們頂多有一點不滿的情緒，若只憑「情緒」定罪，什麼「憲法」眞該倒過來寫！現在他們上了名單，無立足地了，不得不拋棄一切，走上梁山。「逼上梁山」這句話，現在意義最深刻！寫到這裏，外面同學嚷着時集合，說軍警衝進來了，要搜捕，同學們很慌亂！天哪！對無辜青年們這樣迫害，還成什麼國家！不寫了……

DP上

樊弘先生更正

編者先生：手教敬悉，至以為謝。弟異常難過，因為今天發現政府的發鈔總額，在拙文中，有一可笑之錯誤，請依王雲五部長之談話，予以改正。弟云發鈔總額為兩千（誤寫成百）萬億，只用六億點七金元券，即可收回。但據王雲五部長稱，「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僅需二億金元券，即可全部收回。」（中央社南京二十日電）王氏為部長，當然以他的話為最可靠。事關重要，千乞代為更正，毋任感荷。

弟樊弘啓　八月二十七日

歡迎讀者
直接定閱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五卷第二期
三十七年九月四日

本期作者

趙超構：上海新民報主筆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段連城：
李廣田：清華大學教授
沈宗徽：清華大學學生

論政府大捕學生

趙超構

「八一九」是個緊張的日子，在那天，幣制改革了，金圓券代替了法幣；同一天，各大都市開始拘傳「匪諜嫌疑」的學生。從南京、北平開始，跟着重慶、漢口、杭州、上海各地的特種刑庭也紛紛傳訊學生。到現在爲止，南京北平兩地所要傳訊的名單業已發表，南京是一百七十九人，北平是二百五十人；其他各地，只知道上海已傳訊了六十三人，重慶傳訊了三十六人，杭州傳訊了三人，究竟還要傳訊多少人，未見官方正式發表。

這一次「拘」「傳」學生，選定了金圓券出世的日子開始行動，我以爲不是無意的偶合。利用全國人聚精會神於緊張的經濟生活的劇變關頭，拘傳學生，因此得以掩蓋了這個行動的刺激性，在人心的比重上，在新聞的編排上，金圓券的發行和金圓券發行以後的發展已使這些學生的命運受不到人們應有的注意。同時政府當局也曾正式表示，「改革幣制」與「肅清匪諜」是戡亂時期安定後方的兩大「必需措置」，既然兩者是相關的，而幣制改革在目前總算是順應人心的，因此，也可將逮捕學生的刺激性轉嫁一部份給金圓券頭上去。正如抬價的「奸商」是一般市民所痛恨的，一方面捉抬價商人，一方面捉學生，使人覺得政府決不會是於彼而非於此，一定找得有些道理的了。

不僅這個日子選得巧妙，在手續上，這次行動也較爲完備。學生所受的，是特種刑庭正式簽發的傳票和拘票，這便得有些爲人師者也力勸學生不可不自動投案。

爲了上述的兩點，一般人以至文化界對於這一批被捕學生，似乎沒有像過去那樣關心，做師長的對這次事件，心裏當然難過，但也覺得無可奈何。除了希望法庭的迅速偵審，公平處理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意見了。

但是，我不認爲這就是定案，爲國家着想，爲青年着想，不能說就沒有其他的看法。

× × ×

我覺得，在交戰中，潛伏間諜是必然的，間諜利用機會掀風作浪，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贊成當局者將間諜看成如此偉大，以爲他們眞有單獨操縱青年鼓動學潮的力量。在此次拘傳學生的前幾天，中央社公佈了一個文件，認定每一次的學潮都是「匪諜」領導。這使人馬上發生一個感覺：爲什麼這些潛伏的匪諜，在如此不方便的情形中，能發生這樣大的領導作用？一個學校，校內有師長的管教，校外有治安機關的協助，爲甚麼還領導不起青年來？

事實的情形應當是如此的：過去政府施政的失敗是事實，社會上許多不公不平是事實，大多數人民的窮苦不安是事實，青年學生爲了現實的刺激，不能安心求學，以至於不滿現狀，要求改革，有所批評，有所表示，也都是事實。

理性一點看，學生們的言論行動可以解釋爲對政府對政治的表示，自然可以說是有政治意義的；可是，政治性的表示正就等於政黨的行動。與青年學生抱同感，甚至同情青年學生的，也不完全是共黨份子。例如反扶日運動，共黨份子可能順水推舟，參加在裏面，但是青年學生舉行這個運動自有其純潔的一方面，未見得完全是「異黨」操縱起來的；同時，與青年學生抱同樣態度的，同情反扶日運動的，有他們的師長先輩，有工商文化界無黨派的人士，也有從前的參政員和現任的立法委員等等，這是一種頗爲普遍的心理反應，能說青年們是完全受了「異黨」的利用麼？

要清算歷來的學潮，必須將學生本身的政治行動和政黨行動區別清楚。就任何觀點看，學生批評政治是好現象，國民黨訓政二十年，其目的就在訓練人民能夠參加政治，監督政府，學生有知識，有熱情，如果還不能有政治覺悟，還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興趣麼？假如多數公民都能像現在的青年學生關心政治，勇於批評，豈不是訓政的大成功？豈不是國民黨對國家的大貢獻？

這樣說，並不是空話，歷史可以作證：民國以來的學生運動，在發生的時候固然都給當時的政府以煩擾，事後看來總是功多於過。五四運動是一例，抗戰前夕的學運又是一例。這兩年的學生運動，目前看來不順眼，但安知將來國民黨的皐

新和未來政府的進步，不是這些學生叫喊出來的呢？中國的人民是沒有聲音的，除了青年學生，還有什麼人最能代表多數人民的利害？

因此，我們誠懇的希望在處理過去以及以後的學生運動時，對於學生的政治表示有較寬大的看法，對於「匪諜」的活動有較嚴格的解釋，我們雖然不能很具體的說出兩者的絕對界線，但是執政者倘能出於愛護學生的觀點，而不是出於暴燥的心理狀態，將每一次客觀的事實在法律上作嚴格的解釋，將批評政府與武力顛覆政府的行動作精確的分別，我相信這一次被捕的學生中，必有很多不必要的。固然，傳訊之後，還得偵查，審判；判決之前，誰也不知道那一個是罪有應得那一個是冤枉的，可是我們既無冤獄賠償制度，這些被傳訊的在時間和自由兩方面的損失已是無可補償的了。

× × ×

站在文化界的觀點，這種大規模的拘傳學生，對於每一個無黨派的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都發生威脅的作用。往常發生這種事情，照例各校教授、雜誌、報紙以及文化界人士總有一些反應，而這一次事情發生已經旬日，除北大師範兩校教授多人宣言抗議以外，尙未見有人起而批評。批評得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一件事情到了無人批評的程度，即可以反映壓力的分量。順着壓力的聲音必然强大，抵抗壓力的聲音必然微弱，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相信全國文化界人士對此都無感想，對於一個有决死的勇氣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言論是絕對自由的，但我們是普通人，普通人爲恐怖心所驅，不能不卑怯，不能不吞吞吐吐，因此我覺得從此以後，言論自由眞成了理想了，文化界即不成爲政治的奴隸，恐怕也將是政治的順民了。

這是很可怕的現象，這現象表示文化戰線被征服了，再也難得有獨立的批評與見解了。政府當局將聽不到反對自己的聲音。第一次歐戰時，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爲了反戰演說，聽衆斥爲國賊，然而英國官吏並不以爲他反對國策即是敵探，也沒有因此限制他的活動。這是英國的民主。我們正在倣效英美式的民主憲政，但是麥克唐納的勇氣與英國政府的寬容精神並不存在。只要「爲匪張目」四個字，便可以封住全國人民的嘴巴。我們知道，民主之可貴，法治之可愛，乃在於能讓一般普通的人都敢於隨便發表他的議論，而不必有待乎特別有勇氣的人出來說話。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在目前已微弱得可憐，而這一次逮捕學生的行動，無疑的又加濃了一片恐怖的黑影。這對於民主憲政的前途，是佳兆還是惡兆？我想執政者自己也是能明白的！

× × ×

爲了減輕這次被捕學生的損害，迅速的偵審是必要的；延長羈押不僅使學生多受不必要的痛苦，也將影響法庭的威信。爲了消除此事所引起的恐怖空氣，審判應當力求公開。

審判公開是爲了保證公平裁判而樹立的司法原則。其意義是承認人民對司法權的行使有監視之權，同時亦是維持法院本身威信的最好方法。

英美式的民主觀念，是否認階級對立的事實的，因此，國家和法院，是以公正的第三者自任，對各階層的人民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自居的。即使被審判者是信仰階級鬥爭的「匪諜」，他們的供詞或許會詆毁現在的政府，或許有煽動的言詞，但是，法院正好讓他們的政治意見宣達出來，讓檢察官與辯護人的駁述辯論公開出來，訴諸民衆的批判。

公開審判，一般人可以知道審判是無私的，並沒有偏袒政府；公開審判，可以用事實來證明法院是獨立的第三者，不受外力的干涉與影響。公開審判，可以讓一班人了解全部案件的事實，而免於揣測懷疑。爲了法庭的威信，對此次被傳學生的公開審判是絕對必要的。

從幾個世運選手拒絕返國說起

潘光旦

八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載有十五日的倫敦廣播消息一則，說：參加世界運動會的「鐵幕」國家的游泳選手五人，拒絕返回本國。他們業已獲得英國內政部的允許，可以在英國覓一枝之棲。（五人的姓名年歲從略），消息又說：五人現正居住倫敦的秘密寓所。預料當有其它國家選手要求在英國居住，包括南斯拉夫及波蘭選手在內。又說：匈牙利選手麻維克曾經說到，如果它返回匈牙利，前途將無自由進取可言。匈牙利的三個選手都還沒有結婚，但他們也沒有把「亡命」到英國的計畫告知在布達佩斯的家屬。這些消息的來源是十五日的星期電訊報，據廣播說，到廣播的時刻爲止，英國內政部拒絕證實或否認電訊報的這一番消息。

我假定這報導是確實的，因而才有下文的許多話。少數的幾個人從甲地方轉移到乙地方，或暫時居住，或比較永久的占籍，初看是一件很尋常的事，並不值得加以討論。但如稍作仔細的推敲，我們便不難發見這種人事上的異動並不簡單。不要說五個人的異動，就是一個人的，都有它的來蹤去跡，而來蹤的所由構成，背景多總有一大堆的人與物的因素，而去跡所至，前途也不免引起又一大堆的對人與對物的影響。這就顯然的很不單純了。

所謂仔細推尋，所謂人與物的因素，和對人對物的影響，其實等於說我們想對於下面的幾個題目，多獲取幾分認識，或覓取一些解答。一是從事異動的人是怎樣的一種人。二是甲地方有些甚麼情形，教他們非離開不可。三是乙地方又有些甚麼情形，足以吸引他們。四是他們離開以後，甲地方會蒙受些甚麼利害。五是他們留居以後，乙地方會蒙受些甚麼利害。對於異動者本人的利害

，我們撇過不提，我們假定，趨利避害，最後總是每一個人的事，總得由每一個人自己來解釋與抉擇，這是常識，初不必是功利主義派的教條。五個世運選手拒絕回國必屬有些甚麼意義，我們先就這五方面來作一觀察。

第一，這五個人是所謂選手，是體育家。既稱選手，既稱家，在人品的某一些方面必有超越尋常之處。這五個選手在世界運動會發奪過甚麼錦標，贏了多少分數，破過何種紀錄，我沒有加以查考，但在其本國的體育界裏，以至於全世界的體育界裏，他們是佼佼錚錚之輩，總是不成問題的。不但如此，生物學與心理學又告訴我們兩點，一是他們的所以成為佼佼錚錚，一半固然由於訓練修養，一半也未嘗不由於遺傳的素質，而後者尤屬基本，如果不先有它，訓練是徒然的。換言之，體育家自有其成為體育家的那塊料。二是體力不能離開其它的身心品性而獨立，體力的優越表示其它的身心品性，一部分以至於全部分，也多少要比常人高出一籌。這又是屬於原料一方面的話，其它品性的是否也獲得九分的發展，當然要看後天的修養訓練而定，未可概論。總之，這五個人的品質是在中等以上，並且可能超過中等的水平很多；他們決不是添一個不為多，減一個不為少的普通人。

第二，五個選手的本國究屬有些甚麼情形使他們不肯回去，我們不大知道。匈牙利與捷克據說都是「鐵幕」後面的國家。既在幕後，內情自然不容易知道。匈牙利的選手庫維克說，如果回到本國，前途將無自由運動可言。這話也不很清楚。甚麼是自由運動？不能自由參加國際或其它比賽麼？只能有團體操練而不能有個人競賽麼？連個人的自我訓練，跑跑跳跳，也都不被容許麼？因為不甚知道幕後的情形，庫維克的話所引起的這一類問題我們都無從答覆。不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鄉土之愛是人之常情，國家之愛更是近代人的一大特點。除非麻木不仁，除非喪心病狂，除非環境中有種種情形，使他萬分無奈，一個人是決不肯輕去其鄉的，更不肯隨意把國籍放棄，而甘心亡命的。研究品性的學者固然說到有的人有流浪的傾向，別人安土重遷，而他們卻非流浪不可，但這種人為數多屬甚少，並且在每一度流浪的行為發生之初，環境中多少也得有一些推挽迎拒的刺激。五個選手有沒有強烈的流浪慾，我們不得而知，他們都是游泳為多，與流浪傾向的原義有些接近，是不錯的，但這顯然不能有所證明。他們想在英國覓一枝之棲，目前雖然亡命，日久總望能在一個比較固定的地方安居樂業，成為這地方或團體的國家的國民，大概是一個更近情的推論。換言之，他們大概不是甘心於流浪而以亡命為有趣的人。他們有到選手的體格與健康，繼以身心品性相互關聯之論，可知麻木不仁與喪心病狂的這個可能性大概是更不在話下。然則問題的發生顯然不在五個人的本身，而在他們所處的環境，環境中必有種種情形，平時使他們留既不耐，走又不能，而一旦遇有可以遠走高飛的機會，便毫不猶豫的抓住不放，及其既已遠走高飛，也便不再作回返故鄉之想。這番的世運會很清楚的是這樣的一個機會。記得在世運會開會以前，報紙上說到東歐至少有一個國家不準備參選手出場，還附帶說了些政治主義上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理由；無論其理由如何，足見這種機會總是極難得的。我說問題在環境，而不在人，當然也只是一個大體的說法，其實人總是問題所由發生的一大泉源。這五個人至少犯一個毛病，於散會之後，渴要自由，不甘束縛，否則，他們還不是和本國的其它選手一樣，乖乖的回國了麼？

第三，五個選手所從出的國家的情形，我們雖不大知道，其所進入的國家的情形，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人格的自由究屬是甚麼一回事？有些甚麼了不起的意義？我們在這裏可以不問。但自十三世紀初年以來，主張這個，與維護這個，最有力量，最稱一貫，而也最有成績的，我們不能不推英國。一百二十年以來，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激蕩之中，在爭勞苦大眾謀取生活福利的種種努力裏，一面居然避免了暴力與流血的革命，一面，到目前為止，對於人格的各方面自由的發展，始終能繼續予以保證，也惟有英國做得最為差強人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工黨政府的孤詣苦心，調和國治，尤其是昭昭在人耳目。同時我們也得承認無論人格自由之論有無道理，有多大道理，任何民族人口中總有一部分渴愛自由的分子；他們願意為此努力，為此犧牲，有的從自我修養入手，有的致力環境改造出力，如果際遇太惡劣，至於無從措手，則不惜去而之它，根本另尋一個人與境得以調適的新局面，所謂調適的重心所寄當然還是其本人人格的自由發展。五個拒絕返國的世運選手，上文說過，可能就是這種分子。他們的得以到達英國，固然是由於世運的機會，而不由於一己的自由抉擇，但既已到達，可能很快的就感覺到入地願宜，流連忘返，何況其父母之邦又可能有些情形教他們不得不裹足的呢？

第四與第五兩點無須多說。此種人事變動，此種含有幾分選擇性的移民行動，對於移出的國家或地域總是一個損失，而於移入的國家或地域總有幾分裨益。這是人口品質論者的一個通論。五個游泳選手的拒絕返國，如果長久拒絕，又如果真在英國落籍，長養子孫，終於成為英國人口中的一些成分，這一筆國際間的得失賬目，是很清楚的，如果加上前途可能增益的繁衍孳息，此賬目前雖小，將來或許發展得很大。

這現象，從十九世紀末年以來，我們有了一個名稱，叫政治選擇。一種政治而能保留人才，培育人才，吸引人才，增加人才的質量，是正面的選擇；反之，如果驅逐人才，殺戮人才，或無形中埋沒或毀滅人才，便是反面的選擇。繁育與毀滅的正反選擇是絕對的，吸引與驅逐的正反選擇則是相對的，因為甲國家甲地方蒙損失，乙國家乙地方卻有收穫。在國家以至於鄉土分野依然很清楚的今日，相對的選擇還有它的重大的意義。它同時代表着三樣東西：一、它是政治良窳的一個果實；二、它是民心向背的一個表證；三、它也未始不是政治所由更趨改進或更趨腐敗的一個根本因素。這現象表面上是政治的、社會的、底子裏卻是民族的、生物的。政治選擇的名稱雖有了四五十年，人口異動的所以為此種選擇的一個部門，雖也有人不時提到，但據我所知，仔細的探討

還沒有人做過，大概就因為這樣一個題目所牽涉到的方面比較多，從事的人必須瞭解政治，熟悉史地，更須有充分的生物學的素養，並於適用選擇論的眼光，才能下手。近二三十年來，國人喜歡講民族主義；政治選擇應該是民族主義中的一個核心部分，却似乎根本沒有被提到，不能不說是一大掛漏。

任何團體生活總有兩筆賬，一筆人賬，一筆物賬。例如辦學校，註冊管的是人賬，會計、出納、事務管的是物賬。政治也復如此。兩筆賬的目的也可以相比，起碼都求一個收支平衡，而年去年來，更希望收入要比支出略為大些。物賬管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但其重要性是誰都知道的。人賬則不然。戶口或人口應該有一筆賬，固然大家也知道；但人口有數量與品質兩方面，品質的養成又有教育與遺傳兩重因素，則論者往往僅見其一而未見其二。唯其如此，人口的移徙，如果牽涉到的數量不大，就極容易被忽略過去。即如這次的五個游泳選手，如果問題發生在平時，而不恰好在世運方才結束之後，不要說五個，就是五十個，怕也不會有人注意及之。

其實不必等期人口論者或選擇論者出來作精密的研究，歷史上攤着的這一筆收支賬目已經是足够清楚。即如英國，因為歷來政治情形比較良好，大體上說，它所招徠進去的人要比放逐出去的人為多，不過不能太多，因為三島的面積畢竟有限。但是它也吃過虧。十七世紀初年以後，當英國教會和政治發生密切聯繫那一個時代裏，威約所至，曾經逼走過不少的自由分子，而受其實惠，從而立異標新，開基業，又轉而與祖國為難，轉而向祖國宣告革命獨立的，就是今日的美國。其它國家中此種人口分子去就的例子更是不一而足，尤其是在交通比較利便的近代，亞力山大第三時代的帝俄，希特勒全盛時期的德國，殺戮以外，都逼走過不少的人，後者還包括愛恩斯坦一流的碩彥在內，而當時受惠的大部分是美國，小部分是英法等國。中國人雖若比較安土重遷，自由的說法以前也沒有人喊出，但一種自在發展的企求，一種安居樂業，多少想支配環境而不太受環境支配的願望，也始終有它的力量，教一部分人口，轉輾移徙，去此就彼，甚至於轉移到中國政治威力所不能到達的海外。詩經歌碩鼠，孟子美太王，想來當時都有相當的事實依據，決不是一派情傷現實或憧憬往古的空言。降至後代，數量最大而流澤至今未替的一個實例便是五季之世，吳越一帶的保境安民政策所引起的一番向心的人口移動。太湖、錢塘江、新安江、流域的所以成為一個人才與文物的中心，其基礎的大部分便是在這時候奠定的。它如南唐、閩、蜀、在同時期內，也曾從別處吸引得一些優秀的人口過去，但，只是一兩個比較開明的政治領袖，而沒有一個長期的保安政策，其招徠成效究屬不大，並且也不易維持。

普通的人口移徙，我們這裏不談。它所引起的往往只是一些因數量上的變動而發生的經濟問題，例如勞力缺乏或勞工過剩以及分配的重新調整等，這些雖也有它們的重要，不在本文的範圍以內。上文一再說到品質，說到選擇，說到人才。我們不妨再問一下，何以見得某一種的移民，初不論人數的多寡，是品質較好的呢，是經過選擇的呢，是不妨稱為人才的呢？或者換一種問法，在甚麼一些條件之下發生的人口移動所引起的問題才不止是數量的，而也是品質的呢？五個選手，既然是選手，問題比較簡單，我們無須多事推敲，上文已經說過。但其它的例子未必如此。他們的品質如何，我們只有推論的一法。推論又有兩途。一是事後由他們以至於他們的子孫在新環境裏所作的貢獻來推論，而這是需要相當長的時期的，我們姑且不談。二就是由事先的條件來推論。還我以為可以有三個。

一是他們的移徙必須是自動的，是自己抉擇的，即使其間不能完全沒有外力的影響，有如天災人禍，但決不能完全由於強制。捨棄舊環境，參加新環境，不是輕易的事，這其間需要眼光，意志，毅力，吃苦耐勞的精神，隨機應變的能力；這些雖屬盡人而有，分量往往大有不齊，大抵自動者的分量必比較多，所以易於自然流露，而被動者則比較少，若無外緣的強制，可能便各安一世，始終不在行為上表現出來。

第二個條件和第一個相為表裏，就是政治環境必須充分承認遷徙與居住的自由。沒有了這個，一個人，無論自動的志力多麼大，最多也只能以逃亡代遷徙，以寄寓替代居住了。我們從上文的討論裏可以看到，遷徙與居住自由的一大原則，涉之多，意義之大，要在我們平時的瞭解之上，即，在一般的自由與便利之外，更牽連到個性發展上民族優生的問題。除非一個人真有如上文所一度提到的特性，流浪慾，以流浪為生活，為遷徙而遷徙，否則他的目的總不了開基拓業，長養子孫。

第三個條件也是屬於環境的，而一半也牽涉到政治，其它一半則為文化的。就是，統一之中，我們要維持一些分化，大同之中，我們要培植一些小異。一種逐漸擴大的一統與大同之局，最後大到天下一家的限度，是誰都企求的。但我們並不希望國家與地域的分別完全取消，文化與制度的格局通體一樣。我們且認為在不妨礙和平相處的原則之下，地方色彩應當儘量的保留與培養，惟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提高羣居生活的興趣，保持分工合作的機能，轉而充實一統與大同的意義。而說到我們的題目，遷徙與居住自由的原則也才不至於無的放矢。在一切雷同，凡百一致的局面之內，根本就用不着遷徙，不見異，則不思遷，連有流浪慾的人怕也不免攤步下來，還談甚麼自由不自由。

從五個選手拒絕返國的例子看來，這三個條件之中，目下最成問題的是第二個。國際間的移民一向是不很自由的；種族與宗教的阻礙最古老，其次是國族，是很近代的一個，其阻力不在種族與宗教之下，到了當代，我們又添了一個，就是政治意識。所謂「鐵幕」後的國家，「鐵幕」所要隔絕的，斷然不止是消息的內外傳遞，而是人口的自由出入。這條件一成問題，其餘的兩個也就發生困難。遷徙既不可能，一個人自動的能力雖大，也就無從施展。五人者的得以離開本國，和「我選取自由」一書的作者克拉佛真固的得以選取自由一樣，都仰仗一些特殊的機會，普通情形之下是很不可能的。目下流行的各派政治

意識固然全都希望世界大同一統；有的派別目前雖不容許人民自由遷徙，爲的是怕意識未臻固定之際，初則見異思遷，終則愈遷愈異，從而阻礙大同一統的來臨，但一旦眞正大同統一之後，這自由是必然要恢復的。不過，到那時候，問題是，上文已經說過，我們還會有遷徙的刺激與需要麼？大同既同到了意識，統一既一到了思想，普天之下，不再有喬木與幽谷之分，地方色彩，可能只限於吃酸吃辣一類口味之事，我們遷徙做甚？

總之，我們爲了五個世運選手拒絕歸國一事嘮叨了這半天，用意所在，無非要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朋友們瞭解兩點。從小處說，他們應知人口的去留直接間接總是他們政績的一個結果，一些表示，他們是有責任的。四郊多壘，猶不免爲卿大夫之辱，何況治下的善良百姓一個一個的溜了呢？二是從大處說，優良人口的流亡與來歸更是民族興衰，文化進退，地方榮替之所繫，今日的臺灣，可能是兩三世代以後的千里；能存心及此，前途積極的成就雖不可必，至少他們可以避免爲叢毆爵，爲淵毆魚。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中）

張東蓀

§四．我在上文已說過了，中國的統治階級是由一種有遊離性的人們組成的。這些人多多少少有流氓的性質。讀者千萬不要以爲流氓是只限於無產者。中國的富人亦有流氓性的。所以假定我們不把流氓當作一個惡意的名辭，而取中立的意義，則可說中國有兩種流氓，即一種無產流氓，另一種有產流氓。中國的統治階級雖則內部可以起很大的變化，分爲相反的兩組，而仍不外乎這一類的人。統治階級總是以集團的形式來出現。在朝的是既得政權的集團，而每當其末季却另有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每一個集團內有文有武，有貧有富，即有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正如像戲班一樣，其中各種角色俱全。其中貧的固然是爲了打自己的出路，但富的人亦只是散去已有的財，另想發更大的財。所以我們必須明白：統治階級的成立固然是由於人類組織上必須有統治關係。換言之，即必須要有政治。好像無政治，人即不能生活。其實這只是一套理論。實際上並不是那麼一回事。這些人們起來把自己造成統治者却大部分在於謀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並不是專爲了被治者而來治。乃反是爲了治者而始有政治。在這裏治者與被治者之分並不是政治性，而反是屬於經濟性。因此統治集團的心目所想的只有兩件事。即如何維持所搶得的政權與未搶得的時候如何去搶。只有在維持其既得政權的打算下，可能多多少少對於被治的人民的利益有所顧慮。但決不是爲老百姓着想，乃依然只是替自己打算。所以中國歷史上統治關係的建立是以經濟上的封建式剝削爲其基礎。封建式的剝削是由於勢力，而與資本主義下的剝削不同，因爲後者是以資本而取得利潤。在個人主義未被解放出來以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不會有的。所有的只是這種以勢力欺人壓人的剝削。統治階級的人們即建立其生活基礎於這樣的剝削之上。他們的奮鬥完全是爲了取得這樣的生活。此處所說雖是關於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情形，然在目前却有一個活榜樣，就是今天國民黨的政權。

我們明白了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層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則我們便可知道統治階層的人物是如何構成的了。誠如最近一個論者所說，他們是退無可守，進必以戰。所以在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總是處心積慮於如何維持其執政的地位，因爲如果一旦失去了其地位，則其生活便無着了。他們爲了政治生命來掙扎，其實乃是爲了經濟利益來掙扎。這種掙扎有你死我活的性質，決不能像英美民主國家的兩黨輪替秉政一樣就是爲此。兩黨輪替或合作只是見於憲政軌道建設以後，而憲政軌道的成立却與個人主義的文化與工業化的社會有密切關係。在個人主義未被解放出來以前，在工業化未有端倪以前，只有個人的升沈與進退，決不會有政治集團的交替。因爲把勢力作爲一元的決定性，將政治與經濟打成一片，這正是封建社會的特徵。資本主義是二元的，在經濟上操縱力是資本，在政治上運用力是權力，縱使二者可以互相影響。然而總和封建社會的一元性有些不同。在一個統治集團內，時間一長，自會有內部人事的新陳代謝，個人的升沈進退當然不成問題。這些不是我所要討論的；我今只強調一點：即在這樣封建社會，人們的幹政治主要的還只是求生活。所以俗語有升官發財的話，乃是實情。須知他們不能只限於解決生活在官職的任期內，尤必預謀將來罷官後的生活基礎。兼以中國傳統的辦法，統治者爲了容易駕御其部下計，不要有固定的官俸制度。所以在封建社會與專制政治，貪污是其內含的必然性。在此只有程度上大小的區別而已。然而終必愈趨愈甚。一個統治集團最後會被人家革了命，亦就是由此而出。

§五．我在上文說，中國歷史上所有革命都未能把生產力的拘束解放開來，須知其緣故即正由於沒有好方法以安插那些革命家。傳統的對付這些革命家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封功臣；另一個是殺功臣。封功臣是酬庸，因爲大家一齊來打天下搶政權，一旦得到了當然要大家分肥。國民黨於北伐成功以後，下令以黨員盡先作官，便是這種歷史上傳下來的作風。所以當其打天下搶政權的時候總是滿口的弔民伐罪，迨其成功，却爲了這些革命同人的出路，不能不再轉過頭來向老百姓榨壓，不然這些人的生活成了大問題。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換朝代都有這樣的一個嚴重問題。古人早已說過，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這就是說，得天下要靠着一批有流氓性，造反性的人，而治天下却又另需要一批人。果爾則對於前一批人如何安置呢？爲了安置這一批人，使他們得到滿

意的報酬，那只有犧牲本來無抵抗力的老百姓。不但弔民伐罪終成爲百分中之一二分兌現，而即經濟結構亦永遠不會眞開拓一步。於是換朝代乃成爲週期性的了。中國歷史上「君」與「臣」及「民」是三個絕不相同的階級。民是純粹的被治者，幾乎就是奴隸。臣並不是完全被壓迫者，雖則有時亦爲君主的奴役。有時臣能危及君，所以君不能不對這些人有顧忌，尤其是換朝代的前後。我說這一番話雖則是講中國的歷史，但我相信這個歷史的餘毒或病根迄今並未去得乾淨。實在正是我們當前的一個問題。要而言之，當一個旣得政權的統治集團腐敗得萬分的時候，這個統治集團即變爲革命的對象，因爲它把生產力再發展的要求阻斷了，但是旣革命以後，這些新興的職業性的革命人物却亦會變爲阻礙生產力再發展的東西。所以問題就在於此。

不過中國自辛亥以後，外國的一套把戲進來了，憲法啊，選舉啊，政黨啊，這些東西出現於表面，原有的皇帝、宰相等等作廢了。表面上換了一套衣服，而實質却並沒有眞正澈底改變。至少亦得說是一套新制度嵌在舊的歷史餘殘上。在這樣的情形下更加上所謂「失調」(Maladjustme.t)。歷史的餘殘勢力把新制度冲到完全走了樣子。成了一個雜七雜八的東西。我們先就政黨一點而言。不論是民國元年的政黨方式，抑或是民國七年以後的政黨方式，黨員總是爲了生活才來入黨。姑舉一小事作反面的說明。例如一個教員，苟其他自己對於本行有十分把握，不怕失業，同時亦不想升爲校長，則他決不入黨。可見入黨的人總是因爲沒有社會職能上的崗位，或即有而十分不可靠，於是乃靠黨打出路。所以結黨不是爲政治，不是替老百姓做事，乃只是爲了自己。根據這個情形，中國政界上人們的言行不一致乃是先天註定的。換言之，即根本上言行是不會一致的。但言行變到完全無絲毫的一致以後，所以維繫社會之道將盡墮失，其結果只有訴諸武力。這乃是演變到後來所必至之境界。而革命的要求便在這裏潛長滋生了。週期性的換朝代式的革命即從此成立。

§六．旣然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放在我們面前，則著者所以要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解除生產力束縛的破壞工作必須嚴格恪守其限度。其先必須有一個社會診斷。眞要檢查得出病在何處，即眞正被桎梏的地方在何處。然後開刀，恰如其量，不多不少。即破除只可限於那個被桎梏的地方，千萬不可太過。如果事前沒有詳細精密的診斷，而專憑碰碰看去嘗試一下，結果不但會碰釘子，並且一個社會、民族的事，是和一個人不同，一次失敗再來嘗試便須又隔數十年。

我所以特別提出這個分際問題的緣故，就是有見於專依靠這種由歷史上惰性所成的遊離分子爲革命動力決不會摸得出這樣的分際。老實說，在這種傳統的辦法情形下，這一批人是決不會做到恰合分際，因爲合乎分際而不太過，乃是與他們的利益相違反。他們的主要目的還是自己在經濟上生活方面求出路。而眞正爲了解除生產力的桎梏却有時只須要去掉那一些障礙爲止。障礙有時亦可能不太多。所以僅僅如此做是不能對於他們的問題有所裨助的。這裏亦有一個問題，乃是歷史上所有的革命皆會遭遇的一種矛盾，即從革命的動力上說，必須訴諸感情的衝動。類乎發狂那樣。而從指導革命來說，却又必須倚靠冷靜的理智、辨別分際是理智的事。掀起大波瀾則非有感情不可。二者實難得有一個恰好的契合。平心論之，革命本是理智的事。無如專靠理智，不能把革命煽起。故掀起革命要訴諸感情，但感情一起則不易控制。這是一件最難的工作，不可以輕浮的態度對付之。所以歷史上的革命幾乎無一不是犧牲太大而代價不足償其十分之一。換言之，即成就太少而浪費太多。法國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其成就對於人類實在抵不上。俄國大革命死的人數更可吃驚。當時如以現在的局勢爲藍圖而從事製造，恐怕這些死亡都是不必要的。即不死這們多人亦可達到今日這樣的目的。

原來人類的慾望，就普通人而言，有三種，比較上最爲基本的。三種是男女之慾、物質享受之慾、與權力支配之慾。在社會騷亂的時候，這些慾望都會有變態出現。例如在俄國革命的當時，所謂「一杯水」是確有其事，後來不久則經列寧的大聲急呼的反對而始絕迹了。本書不談這一點，故不往下再說。所要說的只限於物質慾與權力慾。這兩個慾望的消長是資本主義的放任經濟與非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有關。在放任經濟下，人們偏於向物質慾方面去發洩。即獨佔性企業的大資本家往往要操縱政府亦依然是想更得較多的利益。一旦改爲統制，則人們的物質慾總會受到限制。於是其慾望的發洩使自然偏向到權力方面去了。往往在政府有加强其權力的需要時，即在大權政府時，政府內部極容易爲權力之爭起衝突，生磨擦。這就是物質慾受限制時有時反使權力慾增高。換言之，即二者的消長不是正比例的。雖然往往在初期還能向外發展，不致於內部自起權力之爭，迨到後來擴張到了相當程度或停止了，却不免要有種種問題引起衝突。這一點，似乎爲謀國者所應注意。

根據上述的種種，我們在歷史先例上可以取得下列的教訓：凡是一個革命，總包含兩個階段，一是破壞舊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壞舊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對於建立新的之障礙。換言之，即問題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舊的，而反在於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內部困難。

「紅帽子」在美國

——記「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

（美國通訊）

段連城

四個月前某天，華盛頓星報的主筆召見一個採訪醫院的記者，問他是否相信共產主義。這個年輕人，相信自己是生長在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家裏，遂直說是。主筆先生很誠懇地告訴他，說報館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但是要開除他。事後，華盛頓記者公會發表聲明，認爲相信共產主義，是一個「公正而充分」的開除理由，因爲那種人已經「不再有任何價值」。在美國，沾着一點紅顏色的，就

是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

因此，在政治鬥爭中，「紅帽子」遂成為一個很厲害的武器。進步黨領袖華萊士，如今已讓政客們及「輿論界」給得遍體皆紅；故總統羅斯福，被人鼎做「共產黨」，也是屢見不鮮；就是杜魯門先生，在南方「白人優越」論者的口中，也是跟共產黨「頂着鼻子走」。在一片「獵紅」聲中，最是有聲有色的，莫過於眾議院的「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了(後文簡稱非美會)。與該會並肩工作的，是參議院一個行政費用審查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前者主席是湯麥·杜馬氏(J. Parnell Thomas)，後者主席是荷馬·傅格生(Homer Ferguson)負責執行調查的，是美國特務機構「聯邦調查局」。

公審女間諜

最近杜魯門總統召開特別國會，這兩個委員會，遂也開始工作。一時「紅帽」亂飛，牽涉到任重要政府官員，消息震驚全國。首先，是報紙傳說，謂有一個金髮的妙齡美女，曾任蘇聯間諜，現在向當局招供，揭破共產黨情報網。七月三十日，伊利莎白·貝特麗(Elizabeth Bentley)小姐出庭了。褐髮、肥胖，雖然她當庭拒絕回答年齡，顯然是四十來歲了。旁聽席上，禁不住一陣失望的微微騷動。她沒有長篇地講出任何驚心動魄的間諜故事，供辭中卻牽扯了三十個前任政府官員，說他們直接或間接地供給她政治及軍事情報。她的職務，是一個小組聯絡員。在這三十人中，有前任國庫部副部長懷特(Harry White)，及羅斯福總統信顧問居里(Lauchlin Currie)。居里戰時曾兩度率領代表團到中國，在「時代」週刊刊出他的一張照片，背後還懸着蔣主席親筆題贈的照片。居里的答覆說他從來沒有認識過一個共產黨人；懷特則氣得直呼「荒謬」。這位自首間諜貝小姐，似乎拿不出具體的證據。

其次要緊的，是商務部要員雷明登(William Remington)。雷原任戰時生產局。貝特麗稱在戰時常從他會面於公園或街角，拿到許多有關飛機生產的資料，雷採悉美國在造原子彈，與超級機密中樞消息。雷之供辭，則謂貝以新聞記者及研究工作者之資格出現，索詢資料，他亦沒有給她任何不可為其他記者知道的消息。他之所以聞或與貝小姐會晤於街角或公園者，無非「年輕浪漫」而已。貝小姐竟也無辭反駁。

於是，非美會不得不推出另一張王牌。這個「改過自新」的共產黨，是原任共黨機關報紐約「每日工人報」總編輯的白登(Louis Budenz)。他出庭作證，謂蘇聯第五縱隊任職美國政府者，數可以千計。他說他無法具體證明貝小姐的供辭，因為雖然他自己也參加過地下工作，但是共產黨的情報，機密到「左手不知右手在做什麼事」。不過，他充分相信貝的話是真的。於是，報上又出現了另一個「悔過」的共黨間諜，但是一「時代」週刊的高級編輯張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他說出的一串共黨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更是嚇人。

第一個，是前國務院遠東司長希士(Alger Hiss)，在舊金山會議時，擔任過美國代表團秘書長，並曾陪伴羅斯福參加黑海會議、聯合國等重要會議。據張伯斯稱，希士在戰前就擔任一個共黨情報小組的首腦，主要工作，是幫助共黨人員「滲透」入各政府機構，以便收集情報，供給蘇聯。張氏當時，屬於希士小組。當一九三七年彼脫離共黨時，曾力勸希士自新，希士甚為動容，痛哭流涕，但結果還是不肯回頭。這一段故事，講得繪影繪色。兩天以後，希士自動出庭作證，宣誓以後，却說他根本不認識張伯斯其人。張伯斯也曾經宣誓，堅說他認識希士，只可惜也拿不出任何確切證據而已。

在這幾乎是黔驢技窮的時候，非美會的「紅」人又大放異彩，說找到一個「神秘」證人，可使全部間諜案水落石出。兩三天來，多方渲染，只是不見其人。據報稱此刻的廣播新聞，這一「神秘」證人，也無非是另一個「自新」的共黨通訊員，由聯邦偵探傳訊到案，他即使出庭，大約也只能證實前頂「紅帽子」而已。非美會諸公，反正「獵紅」任務已達，也不會斤斤計較證據如何了。綜觀非美會的十年歷史，危言聳聽，替報紙製造大新聞，本是其一貫作風。

大破好萊塢

這委員會創立於一九三八年，由馬丁·戴氏(Martin Dies)主持。初意是調查納粹黨徒及共產黨在美的反叛行動。馬丁是一個好砲手，他以宣稱當年好萊塢童星秀蘭鄧波兒有共產嫌疑而名聲遠播。馬丁死，杜馬氏繼位，青出於藍，每年都有大砲。一九四一，他說美國軍中處處是間諜；一九四三，他說政府官員，都僱用「不務正業的女孩子」做秘書；一九四六，他說田納西州的原子彈工廠，機密在「美國以外」的人手中。每次他都大呼調查，說得聳人聽聞，但照例長篇無證據，也無下文。在非美會的一大串紀錄中，最精采的，當推去年十月的「大破好萊塢」了。

杜馬先生，一聲吆喝，說共產黨控制了美國電影事業，在替蘇聯作宣傳。霎時間傳來了大批好萊塢名星。在眾議院會議室中，只能容納三百人的旁聽席，擠得水泄不通。在場有一百二十個記者，三十個廣播員，六個新聞電影攝影機，及一架無線電傳真攝影機。在強烈的水銀燈及攝影鏡光下，不少人帶起了黑太陽鏡。因為牽涉的多是男名星，旁聽席上逐多是女人。當演「魂斷藍橋」的小生羅勃泰勒發言時，旁聽席上歡呼與掌聲不停，杜馬氏敲斷了一隻維持秩序的木鎚。三個禮拜的審查，熱鬧非凡，震動全國。但杜馬氏並沒有找出什麼共產黨控制好萊塢的有力證據。審查終結之前，他雖大吹大擂，謂將公佈一批好萊塢出品，替共產黨作宣傳的影片，結果毫無下文。

「獵紅騎士」杜馬氏

「非美行動」，鬧得如此滿城風雨，然則究竟何謂「非美」？美國法律，並無註釋。答案恐怕只好由杜馬先生就找尋，因為照他解說是最正牌的「美國主義」(Americanism)者了。他曾經說：「美國主義，就是保守主義。一切激進份子，都是「非美」。因此除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外，他更把「新政者」也放入「非美」項下；同時更說明了「同路人」(fellow travelers)及「淺紅漢」(Parlor Pink)，以包羅所有不保守的政治組織。

正統「美國主義」者的杜馬氏，是一個死硬派的共和黨徒。家窮並非豪門，但早年在「華爾街」混到一碗飯吃，逐培養起對老闆們的忠貞。他最近得意之中，告訴一個記者，說他在學校「從來不是一個好學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校裏有一個論戰演講會，中途有幾個左翼學生反對。「你知道我怎麼辦？」杜馬氏驕傲地說：「我邀集一批人，把那幾個傢伙頭髮剃光，丟在一個全是癩蝦蟆的泥池裏」。他頓了一頓說：「我在一哩路外，就可以嗅到一個共產黨徒的味道」。

維持「民主」牌招

最近杜魯門提出了保障黑人的「人權法案」，南方主張「白人優越」的議員紛紛發起三K會(Ku Klux Klan)，大肆活躍。數百門徒相聚，穿起白袍，披着白面紗，舉高燃燒着的十字架，發表宣言說：「要是人權法案通過，街上將有血流成河」。這個會不但在提倡種族優越論，而且在組織及行動上，都與納粹黨有密切連繫。他們反對黑人、猶太人、羅馬正教徒以及一切來自東南歐的美國人，至於共產主義，更不用說了。在非美調查會中，也有個「法西斯調查組」，最近作了一個報告，說三K會是「道地的美國組織」，當然不是「非美」！

當非美會在大丟「紅帽子」的時候，美國共產黨最近

卻在紐約公開舉行全黨代表大會，制定政綱政策，宣佈支持華萊士的進步黨。這個似乎矛盾的現象，顯示出美國政客們硬要維持「民主」招牌的苦衷。他們既仇視一切進步的份子，但同時又覺得在這樣一個號稱信仰自由的國家裏，不能遽稱某種主義或學說不合法。所以美國共產黨，理論上說，現在依舊是一個合法的政黨。不過美國一般人民，對共產一字，多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疑忌與厭惡，政客們遂針對這一點，盡力在每個共產黨員或左翼份子，以至於一切改革派頭上，加一頂歸類的「紅帽子」，使他們在社會中困難甚至於無法生存。在這一點上，非美會有過很重要的貢獻。

在美國的選舉中，每個人投票時，至親如夫婦，也得站在三尺以外。因為憲法曾經明定秘密投票，以便人人可以不受環境影響，自由選擇他的政治信仰。既如此，非美會在大庭廣衆中，全國新聞界前，盤詰個人的政治意見，是否合法，本極明顯。所以過去許多被傳訊的人，對非美會「你曾否做過共產黨」的問題，都依法拒不回答。結果卻被加以「蔑視國會」罪，遂交司法機關議懲。今年五月，非美會的兩員健將孟德（Karl Mundt）及倪生（Richard Nixon）曾提出一個反共法案，要求所有共黨政治機構及「外圍組織」的負責人與會員公開登記。這個合法化「紅帽子」的法律，雖經衆院通過，終因與「民主」招牌衝突太甚，而在參院擱淺。

杜魯門與「紅魚」

七月二十七日，杜魯門召開特別國會，討論物價及房荒，這消息一直是報紙的大標題。五天以後，非美會開會，搶去了華盛頓消息的一大半。兩三天內，非美會竟變成頭號大標題了。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憤怒地說：「反美會的調查，無非是一條紅魚，來分散公衆對物價與房荒的注意」。這話指出了非美會的另一政治目的。在這大選的前夕，杜魯門預備了大批新政色彩很濃厚的提議，交給國會討論，要想討好低層大衆。共和黨製造的這條「紅魚」，不但搶去了他的生意，同時暴露了民主黨的政府，如何讓共黨份子與蘇聯間諜「滲透」；美國的「安全」，如何在受威脅。

此外，非美會之選定這時候上演新戲，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打擊華萊士的進步黨。在這一次被牽涉上的前任政府官吏中，有好幾個是華萊士新黨中的要角，更有很多是前商務部內華氏的舊部。因此竟有人提議要調查華萊士。本來，在今天的美國，并沒有多少真正的共產黨（美共黨員數目，據該黨最近全會宣稱，也只有六萬人）。況且共產黨在美國社會中，也難起大作用。最近，十二個共黨領袖，已因「圖謀暴力推翻美國政府」而被拘到候審。所以「華爾街」真正的陰蓋，是一切反共的自由主義者；而非美會的目的，也即共拿着「紅帽子」的法寶，使他們噤若寒蟬。

至於一般的美國老百姓呢？在戰後繁榮的今天，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歡喜熱鬧是他們的天性。報紙上，廣播裏，聽說電影名星是共產黨，大官也是蘇聯間諜，倒也緊張刺激。究竟這些事是什麼意義呢？他們很少功夫去想。去年底，當政府開始公務員「忠實調查」（Loyalty Check）的時候，一個南方的女人，因為"Check"另有一個通義是「支票」，遂以為政府在發「忠實支票」。趕快寫封信給政府，說她戰時從軍，任婦女輔助隊員，服務熱心，請勿忘"Give me a loyalty check"。當聯邦調查局的人來找她時，她大呼：「擁護民主，我不知什麼是共產主義，我以為是錢！」

人人都擁護「民主」，究竟美國的「民主」是什麼？替紐約時報撰文的一個作家，日前去訪問非美會主席杜馬氏。問他什麼是共產主義，他說：「無產階級獨裁，奴役人民，」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他說：「我想差不多」；什麼是民主？他想了一想說：「民主嗎？反正每個人都知道」。誠然，反正每個人都知道！（八月七日寄）

文明在生死之間

Civilisation on Trial　The Listener July 15 1948

Arnold Toynbee

現代西洋文明正在被考驗！這也許是一個新鮮的觀念，也是一個新奇的觀念。「文明」一詞對我們大多數人看來正是指和那些會被考驗的東西相反的對象。大戰之前——至少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我們常認為文明是美如黃金，安如磐石的。我們祖宗們可能曾歷盡艱辛締造我們的文明，但是我們卻覺得並無喪失這家傳寶物的危險。

我想，對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世界不發生懷疑是很自然的。和我年齡相若的一輩英國人，在一九一四年前長大的，對於現代西洋文明確是認為不必懷疑的。我們在那時沒有文明會被考驗的想法——我們那時並不權衡這種文明而發現它的缺點。就是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個文明已在被考驗的觀念在很多人還是會覺得驚異的。無論如何，我們的文明可能遭遇災難的警覺現在似乎已經在盪漾了。我去年春天曾在美國住了三個月，在那裏我發覺這個問題已進入一般人民的心頭，這對於一個歐洲來的旅客當然是個很深的印象。在我們看來美國人現在正站在權力、財富、和繁榮的塔尖。但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卻可能比我們更為不安和恐惶，雖則我們英國人所住的地方才是大西洋更不安全的一面。

美國人比我們更為忐忑不安是因為他們的失望比我們更大。美國人渡海遷移到新大陸，原是想和歷史割斷，而現在歷史卻追蹤了他們，而且已經趕上了他們。歷史不開玩笑的，因為在它的櫥窗裏陳列着骷髏——不祇是一付，可能已有二十付。它們是文明的骷髏，在過去遭受了災難的遺體。當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的前途不覺得有錯失時，這些尸首不會使我們不安；現在它們確已引起了我們懍然之感，我們的自信已受可怕的禍患，驚人的罪過和冷酷的殘忍所打擊，這些就在我們這一代，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眼前發生。我們驚疑這些可怕的經驗究竟是什麼意思。它們是否指出我們自己的文明將和歷史櫥窗裏的那些骷髏同其歸宿？

我們想得到的那最初被毀的文明是希臘和羅馬。它的衰亡和崩潰和我們特別親切，因為我們自己的文明就在它的廢墟上長成的。羅馬帝國的興亡陳跡，我們會重演這一套麼？羅馬帝國滅亡時曾遭遇些什麼？如果我們回頭看看羅馬帝國的滅亡，和希臘羅馬文明的解體，可以見到幾條線索：物質上生活程度的跌落，這一點我們現在已經感受到了；理性主義的降低——退回到愚昧和迷信；行為標準的下降，法律和秩序的式微——退回到野蠻程度。

就那些必須承受些痛苦經驗的人說，我想，物質上生活程度的跌落是最容易應付。在羅馬的末期，財產成了負担——並不是他們不喜歡享受，好逸惡勞原是人性之常，

而是因為代價太高。財產所有者在羅馬末期所付的代價是他日常生活各項細節所受到的管制。我們這一代和這世界，在這方面也已經有相當的經驗，但是羅馬末期的情形比了現在却還要嚴重，嚴重到人們寧願蒙受極大犧牲，設法逃避這類管制。注意精神生活的人把財產分給了窮人，遁入空門做和尚或是做隱士；積極性的人逃到遠處的野蠻人裏去自求出路。最後，希臘羅馬文明整個複雜的物質結構崩潰時，大多數的人反而感覺到喘了一口氣。

最可怕的事倒並不是物質享受的喪失；生活簡單化了也減少了許多複雜文明裏的煩惱。可怕的不是物質的崩潰而是道德的崩潰：愚昧，迷信，無法，殘忍的勝利，克服了希臘文明在它好的日子所建立下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文明崩潰時可怕的事，我相信，我們現在所最懼的也就是這道德退化到野蠻程度的危機。我們已受到警告：在西洋的中心地點，就在這一代，我們已遭受德國納粹的道德災禍。如果西洋有一個大國會屈服於此，很明顯的西洋的道德標準已經不夠穩固了。德國可以發生的事，誰能保證不發生在其他的地方呢？道德的破壞才是文明陸沉中的真正悲劇。

孤立的事件還是通常的遭遇？

但是我們是否需要提醒自已會有相似的遭遇麽？這是要看希臘羅馬文明的陸沉是一件孤立的和非常的事端呢，還是自然秩序中有規律的事例。當我們在報上讀到火車出軌或是某家失火的新聞，我們並不會因之預想自己的房子今夜也會失火，或是明天自己所要坐的火車也會出軌，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是意外。如果這類事情每隔一天就會在我們的街上或鐵路上發生的話，我們也不會這樣坦然了。所以關於希臘羅馬文明的陸沉這件事我們第一要問的是：這件社會的災難是不是歷史上的例外？歷史上還有類似的情形麽？這問題的答案，我怕，並不是愉快的。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裏去重讀一遍歷史，我們確可以找到不少同樣的例子。

我們首先提及希臘和羅馬，因為我們對於這段歷史是較熟悉的。我已說過，我們自已的文明是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上長成的。希臘羅馬文明同樣的是長成在另一早期文明的廢墟上。這早期文明是Minoan文明，它很早就滅亡了，連它繼承者的希臘都不再記得它。但是在上世紀的末年被一位英國的考古學家 Sir Arthur Evans 在克利脫島上發掘了出來。我們還不能理解 Mincan 的文字，但是考古學家却重新發現了這個文明。他們告訴我們這個文明和後來的希臘羅馬文明一般也有過一個興亡的故事。

這裏不過是兩個早年的例子，我們如果看看世界的其他部分，同樣的例還多着。以遠東說，這是個在最近以前還是和我們不發生太大關係的區域。在這區域裏却有類似的歷史。中國的古代文明也有它興亡的軌跡。在二世紀的時候他們的大帝國瓦解了，比了羅馬帝國的瓦解早二百年。如果在已死已葬的文明以外再加上那些雖則還活着但已無可否認的在式微中的文明，這類例子我還可以列舉二十個。依我所可以看得到的說，我們還不能確認其已經式微了的，祇有西洋現代文明。

如果這些是事實的話，我們現有的處境是很奇異的。我們好像是站在一間房裏，這房裏躺着許多尸體，就是那些還沒有死的人也已經病得很深。這個唯一還能站着和還能觀察四周的人，他明白了這些尸體生前所犯的病症，他還也看見那些病人正犯着這些病症，而且可能跟着要走上死路了。他必然會懷疑他自已是否惟一的例外。他是否也會遭遇同一運命？也許他已經表示了致命的徵候。所以他開始檢查自已，含着溫度表不斷的看自已是不是在發燒。他恐惶了，他即使不死在瘟疫裏也可能會死在恐懼裏。這是，我願意說，西洋當前多數人的心理狀態。

我們既已說到這裏，也就不能停住在這裏了。我們不能以一個問題來滿足自已，這一個生和死的問題！我們必須設法推究這些歷史前例對於目前情況有什麽啓示。我們自已的文明是無救了麽？我立刻將給你們我個人的答案。我並不相信任何文明的滅亡是運命裏注定的，我也不相信它們都犯了無可挽救的病症。所以我們不必斷定我們是無救了，低着頭，讓運命的刀在斷頭台上落向我們的頸項。

如果我們果真這樣束手無策，我們的頭是該這樣被斷的。你們可以盡問我，你不是告訴了我們二十個文明已經滅亡了麽？現在不是將輪到我們了麽？我們會是惟一的例外麽？不是的，我的答案並不如此。我可以給你說出兩個理由。第一是二十個例子並不能構成一個原則，第二是人事中太多不易預知的因素，隨時可以改變它的前途。我們自覺當前的危機就是一個足以自救的心理因素。假如我們不垂頭喪氣，等待死亡，而奮發起來，這就可以轉換我們的前途了。

喪命於戰爭中的文明。

讓我們看看那些滅亡了的文明怎麽會死的，然後看我們是否能避免這種致命的錯誤。我相信它們都是喪命於戰爭的。這些文明的歷史中，都發生過地方政治集團間日形嚴重的戰爭，雖則這些被戰爭所致死的文明在最後的一期常能結束戰爭，但是隨着戰爭而起的却是更深的病症。它們是以取消地方政治集團的方式來結束戰爭的，取消地方政治集團的方式是征服，一個強權把所有的競爭者都擊敗了，推行和平——羅馬帝國在希臘世界所強行的和平是一個我們最熟悉的例子，同樣性質的和平在同一的方法中在中國推行過。羅馬式和平的弱點是時間太遲和代價太大。而在交戰集團沒有打到筋疲力盡時，戰爭是停不下來的；而且停下來時，社會的損害已經太大到不易復元了。因之這種和平不能持久。它不過是拖延一個垂斃的文明的死期罷了，並不能救它的生命。

我們現代文明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是：我們是否將用羅馬的醫方法來結束戰爭？我們能否不從力竭停戰的和平中去制止戰爭？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曾不斷尋覓以同意和合作來團結世界以致和平的道路，想用以代替暴力和征服的舊路。如果我們能有所成就，那就是以往的各種不免於滅亡的文明所沒有的成就，那也足以為人類歷史開一新頁。這是我們對於文明陸沉論的答案。讓我們不要對這危機閉上眼睛，面對這危機時也讓我們不要手足無措。我們得在我所建議的自救之道上去應付它。我們並沒有注定了滅亡，運命在我們手上，一切在自己。

最完整的人格

——哀念朱自清先生

李廣田

佩弦先生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七天了。在這七天之內，時時聽到有人在談論佩弦先生，也看到不少紀念佩弦先生的文字。至於我自已呢，却一直在沉默中，漫說要我自已提筆說話，即使有人向我問起佩弦先生的事，我也幾乎無話可說。我在沉默中充滿了傷痛。假如說話可以解除傷痛，我是應當說話的，然而我的話竟不知從何說起！

在別人的談話中，以及在別人的文字中，大都提到佩弦先生是一個最完整的人。我覺得這話很對，但可惜說得太籠統。我願意抑制自己的感情，試論佩弦先生的為人。

第一，佩弦先生是一個有至情的人。佩弦先生對人處事，無時無地不見出他那坦白而誠摯的天性，對一般人如是，對朋友如是，對於靑年人，尤其如此。凡是和朱先生相識，發生過較深關係的，沒有不爲他的至情所感的。你越同他交情深，你就越感到他的毫無保留的誠摯與坦白。你總感覺到他在處處爲你打算，有很多事，彷彿你自已還沒有想到，他却早已在替你安排好了。他是這樣的：既像一個長師，又像一個知友，既像一個父親，又像一個兄長。他對於任何人都毫無虛偽，他也不對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熱情，然而他是充滿了熱情的，他的熱情就包含在他的溫厚與謙藹裏面。

正由於他這樣的至情，才產生了他的至文。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他就寫不出「毀滅」那樣的長詩。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他更寫不出像「背影」那樣的散文。「背影」一書，出版於民國十七年，二十年來，一直是一般靑年人所最愛讀的作品。其中「背影」一篇，論行數不滿五十行，論字數不過千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夠歷久傳誦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當然並不是憑藉了甚麼宏偉的結構和華贍的文字，而只是憑了它的老實，憑了其中所表達的眞情。這種表面上看起來簡單樸素，而實際上却能發生極大的感動力的文章，最可以作爲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爲這樣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爲人。由於這篇短文被選爲中學國文教材，在中學生心目中，「朱自淸」三個字已經和「背影」成爲不可分的一體。當朱先生逝世之後的第三天，我得到天津的來信，那寫信人是一個中學的國文老師，他說：「其私，傳言說朱先生去世了，簡直不敢相信，因爲在最近離平之前還看見朱先生，而且還聽了先生很多勉勵的話；及至翻到外邊，看見一羣小學生，在爭着搶着地一張當天的報紙，其中有一個並且驚歎着對我說：「老師，作背影的朱自淸先生死了！」我這才相信消息是眞的，而且，看了小孩子們那一種惋惜感歎的神情，自已竟無言落下淚來。」「背影」一文的影響於此可見，而且，我們也可以想像：有上千上萬的幼稚心靈都將爲這個「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傷的吧！在另一本散文集「你我」中，有「給亡婦」一文，那文字與「背影」自然迥異，然而它作爲朱先生的至情表現則與「背影」相同。據一位教過女子中學的朋友說，她每次給學生講這篇文字，講到最後，總聽到學生中間一片歔欷聲，有多少女孩子且已暗暗把眼睛揉得通紅了。現在，我們翻開「你我」這本書，讀「給亡婦」的末一句。看到他低低地呼喚那亡婦的名字，寫道：

「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讓他們對得起死了的母親你！謙，好好兒放心安睡罷，你。」

我們的心立時就軟弱了下來，立時就感到黯然，這文字中幾個「你」字的安排，最足以表現了作者的情感，而我們也就很自然地想到朱先生身後的陳夫人和三個幼小的弟妹，以朱先生之至情，我們若千遍萬遍地閉上眼睛親囑他「好好兒放心安睡罷，」不知道他可能緊緊地閉上眼睛嗎？

第二，佩弦先生是一個最愛眞理的人。其實，有至情，愛眞理，原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因爲，沒有至情而不愛眞理的，也沒有愛眞理而無至情的。凡是認識朱先生，同朱先生同過事的，都承認朱先生是最「認眞」的人，他大事認眞，小事也認眞，自已的私事認眞，別人或公衆的事他更認眞。他有客必見，有信必回，開會上絕不遲到早退。凡是公家的東西，他絕不許別人借用，即使是一信箋，一個信封。學校在他大門前存了一車沙土，大是爲修繕或鋪路用的，他的小女兒要取一點兒去玩玩，自說不許，因爲那是公家的。聞一多先生遺著的編輯，自始至終，他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主持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條，凡比較重要的，都要找到中國文學系同人的意見，或用開會方式盡情討論，如無開會機會，他一定個別訪問，把不同的意見或建議蒐集起來，然後作爲定案。即使一點必詳討論的事情，擬辦的或已辦的，他都告訴大家。這種一切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認眞精神，也正是他的熱愛眞理的一方面的。沒有一個愛眞理的人而不是在處理日常事情上認眞十分認眞的，在朱先生，由於他的至情，由於他的認眞精神，他就自然地接近眞理，擁抱眞理。從抗戰末期，以至最近，朱先生在思想上的變化是非常顯著的，雖然由於體弱多病，他說，他願意給他自已較多的時間，他不能像年輕人那樣迅速的進步，然而事實上他比靑年人的道路走得更其踏實，因爲他的變化既非一步跨過，也非趑趄不前，走三步退二步，而是虛心自省，一步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去的，他並沒有參加甚麼暴風雨一樣的行動，然而他對於這類的行動總是全力支持的，最少也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力量，擔心靑年人有所犧牲外，他可以說並無甚麼顧慮。他也沒有甚麼激昂慷慨的言論，然而就在他那些老老實實的講演與文字中，眞理已一再地放了光，而且將一直發光下去。

復員以來，佩弦先生出版了很多新書，如「新詩雜話」，「語文零拾」，「詩言志辨」，「標準與尺度」和「論雅俗共賞」等。其中固然有些舊作，但新寫的實在更多。他在「標準與尺度」的自序裏說：

「復員以來，事情忙了，心情也變了，我得多寫些，寫得快些，隨便些，容易懂些。……經過這一年來的訓練，我的筆也許放開了些。不久以前一位靑年向我說，他覺得我的文章還是簡省字句，不過不難懂，訓練大概是有效驗的。」（三十六年十二月）

就在這簡單的說明裏，我們也可以窺見朱先生的若干方面。他是謙虛的，他承認自已在受訓練。他覺得自已有對大家說話的責任，而且要多說，快說，說得透闢，因爲他熱愛眞理，他把握了眞理，他願意從各方面解釋這些眞理，發揚這些眞理，凡是眞心有話說的當然願意說話，而因此他的筆自然也就放開了，凡是思想得到解放的，文字也就自然的得到解放。不過這裏也還藏着一個可憐的事實，朱先生以一身而負着一個很龐大的家累，職業上的薪俸不足以維持一家的生活，爲了應付升斗所需，於是也就不得不多寫了。但無論怎樣多寫，快寫，却從沒有亂寫，因爲他是認眞的，因爲他所寫的是眞理。他是作家，批評家，學者，然而他最近一兩年來所發表的意見却不限於文學或所謂純學術一方面的，這只要翻翻「標準與尺度」和「論雅俗共賞」就可以知道。在「標準與尺度」中有一篇叫做「論氣節」，其中有一段說：

「知識階級開頭憑着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爲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衆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衆抬頭吃飯，他們也沒有滿足這些飢餓的民衆。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着不自由，閉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腳」。他們於是只能保守着自已，這也算是節吧；也只[illegible]往下去，可是氣不足，得等着瞧。可是這裏是偏於中年一代。靑年代的知識分子却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爲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吧？」

在這裏，朱先生不但闡明了知識階級的地位之變遷，尤其可貴的，是指出也肯定了靑年知識分子的新的做人尺度，這些話自然可以鼓勵靑年，但他的話却不只是爲了鼓勵靑年而說的，這裏有他自已的實感，而且有他自已對於現階段歷史性質及現代人的時代任務之確認。而在同書的「論吃飯」一中就提出了更明快的論點，他說：

「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沒飯吃要吃飯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兒壓得下的。沒飯吃會餓死，嚴刑峻罰大不了也只是個死，[illegible]就是力量：「誰怕誰！誰怕誰！」」

一點也不錯，溫柔敦厚的朱先生竟說出了這樣堅決的話。他在「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道路」（聞一多全集序）中，曾引用聞先生自己的話說：「我

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其實，朱先生自己又何嘗不是一樣。關於中國當前的情形，他在「論吃飯」中接着說：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眞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末禮義甚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麼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於匱乏的自由」呢？於是寫出「飢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

只翻過朱先生前一期作品的人，或者只看到了朱先生性行學問的某一方面的人，可能不相信這是朱先生的話，然而這確是朱先生說的，而且說得那麼好，那麼切實，那麼勇壯，這自然是時代使然，然而還靠了主觀的力量，主觀的正義感和自覺心，也就是靠了朱先生的至情和對於眞理的愛好。至於他對於今天的文學的意見，那就更其明快而顯然。朱先生並不是歷史家，然而近年來所寫的文字中却大都有一個史的觀點，不論是談詩文的，談文學思潮的，或是談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歷史的演述，從簡要的演述中，提發出歷史的眞象，然後就自然地得出結論，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當前的任務。在「新詩雜話」的第一篇「新詩的進步」中，他承認「從新詩運動的開始，就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語文零拾」中有一篇「歷史在戰鬥中」，他推崇雜文，說「時代的路向漸漸分明，集體的要求漸漸強大，現實的力量漸漸逼緊，於是雜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支燕子。」在「標準與尺度」中有「文學的標準與尺度」一文，說「社會主義」是今天的尺度，「文學終於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邁進的。」又說，「特權階級垮台以後才見到廣度。從前有所謂雅俗之分，現在也還有低級趣味，就是沒高度深度來比較的。可是現在漸漸強調廣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時也是提高，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在「論雅俗共賞」一書中有「論朗誦詩」一文，他說，「朗誦詩是羣衆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羣衆，他也是羣衆的代言人。……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願望，……朗誦詩直接與實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與工作，……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正是朗誦詩之所以爲新詩中的新詩。」這一切只說明一件事，就是朱先生說話的立場乃是人民的立場，正如他在「論雅俗共賞」的序裏所說的，而最急切的目的則爲新的「民主」文化，新的「民主」文學。爲人民，爭民主，這是今天的眞理，這也就是朱先生近年來所寫文字中的主要內容。

第三，佩弦先生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若說朱先生是有幽默感也未嘗不可，無乃「幽默」兩個字已經被幽默家家們用得不辨眞面目，所以我很不願意使這兩個字來和朱先生發生聯繫。何況，那些幽默專家或幽默大家是爲幽默而幽默，而朱先生則不然。他有至情，可並不一天到晚纏綿悱惻，他愛眞理，也並不逢人說教，他嚴肅而認眞，却絕不板起鐵面孔，叫人不敢親近，只感到苦燥無味。他是極有風趣的，他的風趣之可愛可貴，正因爲他的有至情，愛眞理，嚴肅而認眞。三十一年我到了昆明，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個熟人就是朱先生，假如不是他老遠地脫帽打招呼，我簡直不敢認他，因爲他穿了一件奇奇怪怪的大衣，後來才知道那是趕馬的人所披的毛氈，樣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顏色却像水牛皮。我當時只是想笑，然而不好意思，他却很得意地告訴我一個大消息：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中國的抗戰已成了世界大戰的一環，前途十分樂觀。以後我在街上時時注意，却不見有第二個人是肯於或敢於穿這種怪大衣的。有一次在西南聯大的廣場上開文藝晚會，幾千聽衆都隨便地坐在草地上。朱先生的講題是「五四以來的散文」，他說，「甚麼是散文呢？像諸位這樣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坐法了。」他自己不笑，全場上却哄然大笑起來，朱先生每次演講都引起這樣的笑聲。在他的文字中，更是到處充滿了風趣。在散文集「你我」中，有一篇「看花」，中間有這樣一段：

「至於領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後的事：夏天的早晨，我們那地方有鄉下的姑娘在各處街巷，沿門叫着，「賣梔子花來。」梔子花不是甚麼高品，但我喜歡那白而暈黃的顏色和那肥肥的個兒，正和那些賣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韻味。梔子花的香，濃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樂意的。我這樣便愛起花來了。也許有人會問，「你愛的不是花罷？」這個我自己其實也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論了。」（十九年四月）

「也許有人會問」，其實沒有誰問，只是作者自己在體會那種情意味了。在同集中還有「談抽烟」，「擇偶記」等，都是同樣富有風趣的作品。這類文字看起來容易，作起也相當吃力，即如「談抽烟」，據朱先生在自序中說，才八百字却花了兩個下午，所以這風趣的形成也還是出於嚴肅認眞。近年來所寫的文字大都是非常沉重的，不像前一期的文字那麼輕鬆，然而其中也還是充滿着風趣，如「論雅俗共賞」一書中的「論書生的酸氣」，「論老實話」等，都在嚴肅中見出「幽默」，——這裏我居然又用了「幽默」兩個字，我的意思是說眞正的幽默，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滿含着同情，慈心與正義感的風趣。三十六年二月，他的「新詩雜話」出版了，這本書的編定在三十年十月，書稿交出後便石沉大海，中間一度傳說稿子已經被書店失落了，朱先生常常提到這件事，現出非常傷心的神色，以爲這本書再也不會與世人相見了，不料事隔三年有餘，書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在目錄後的空頁上題道：

『盼望了三年多，擔心了三年多，今天總算見到了這本書！辛辛苦苦寫出的這些隨筆，總算沒有丟向東海大洋！眞是高興！一天裏翻了足有十來遍，改了一些錯字。我不諱言我「愛不釋手」。「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說是「敝帚自珍」也罷，「祇懂情深」也罷，我認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晚記。』

在這段短短的題字裏一連用了四個驚嘆號，第一行上邊蓋了一個「邂逅齋」的閒印，最後一行下邊蓋了一個「佩弦藏書之鈢」，——大概太高興，高興得手忙脚亂，第二個圖章竟然倒置了。

有至情，愛眞理，有風趣，這就是朱先生之所以爲朱先生，這就是朱先生的人格之所以被稱爲最完整的人格之所在，這也就是爲甚麼，當朱先生活着的時候，無處不獲得人的敬愛，而當他的死耗傳出之後，無人不感到傷悼與惋惜。也許有人要問：至情、眞理、風趣三者，何者較重要，何者爲次要呢？我不知道這問題有無意義，也不知道這問題怎麼回答，因爲朱先生的人格是整然的一體，我們不好把它分解開作爲比較。讀前一期散文的人最容易感覺到他的至情，常和他接近的朋友最容易了解他的風趣，而覺得他平易近人，而近年來，在時代的風暴中，在「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嚴肅的工作」的對照中，最足以見出朱先生是眞理的擁護者。朱先生總在不斷地進步，他不但趕着時代向前走，他也推着時代向前走，他不但隨同青年人向前走，他也領導青年人向前走，然而，無可如何，他的體力，他的健康却一天一天地向後退了，他終於退向病床，退向死亡，現在，朱先生，我們的領導人，我們的同伴，我們可敬愛的先生和朋友，却剩下了一把骨灰！這又豈止是個人的損失，豈止是少數人的損失，豈止是文藝界或學術界的損失而已呢！假如中國眞正「勝利」過，假如中國沒有內戰，也沒有「勘亂」，假如中國已經民主，已經和平，假如朱先生生活得好，生活得如意，他何至於這樣地死去。假如朱先生體力好，假如朱先生能夠得到天壽，朱先生對於新文學、新文化、新社會的供獻將是無限的，這由他過去的成績可以證明，由他近年的轉變與進步更可以證明。朱先生在過去盡了他的力，在今天也盡了他的力，如果他活到將來，在新的社會中，將更有他的大用。然而，朱先生竟然這樣地死去了！從我去年夏天來到清華大學之後，就看見朱先生的書案玻璃下壓着兩句詩，是朱

紀錄

三十七年八月廿一日下午四時為警憲在燕京校內搜查學生事對在場的學生教職員跟警憲說話

·陸志韋·

這樣的聚集，在燕大的歷史上還是頭一回。從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點相像的，那是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十點鐘的聚集。所不同的，那一天來校的是仇敵，是日本人。今天來的是我們的同胞。是同胞，將來共患難的日子多着吶！

八月十九日，本校接到北平高等特種刑事法庭的拘票，要逮捕燕大的學生，一共十七名。還有因為「危害國家」的案子要傳去訊問的，一共有十四名。其中有吳其進一名，是本校畢業生，在訓導處服務已經二年了。其餘的三十人之中，有的已經畢業離校，有的早已退學，有的暑假不在校，有的雖然是准許留校的，可是假期之內，住宿的流動性相當的大。所有拘票傳票，實在無法送達。被傳的吳其進既然是本校職員，我就通知他趕快回學校來。不料當天下午他就在東校門讓警憲不問情由逮捕了，送北平市警察局郊六分局了。那天晚上，本校設法把吳其進從郊六分局保釋，隨傳隨到。

從十八日晚上起，學校讓軍警憲包圍了。學生員工都不許出入。食糧斷絕。同時，學校方面兩次檢查宿舍跟校場上其他各處，名單上的三十人之中，並無一人在校。我們就根據事實，報告郊六分局跟這一回負責搜查燕大的林園長，他是二百〇八師的。直到今天十二點鐘為止，地方當局依然不能完全信任學校的報告，以為非進來搜查不可。他們在職務上，不能不有此一舉。這是大家應當諒解的。實在負搜查的責任的，並不是來搜查的人。軍警搜查學校，在民主國家是非常的事件。

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林園長來學校，跟我商量搜查的手續。他態度十分客氣。他說是為執行公事來的。各位，我的處境的困難，就不說，你們也能明瞭。拘票上傳票上的學生，早已不在這裏了。受搜查的全部是跟這事件絕無關係的人，可是學校說話已經不能見信於人。我們沒有力量拒絕搜查。我在學校行政的立場上，並且不能對於非常時期的特種法令表示什麼意見。我當然可以用種種推辭，把這件事拖一些時候。可是我不願意借外勢，也不願意求人情，打官話。我知道你們不要我幹這樣的事。照我的估計，這搜查的手續，早晚不能避免。我並不怕事，我出死入生，是為中華民族經過患難的。我為你們選擇了對於你們最少損失的一種方式，就是說，開了條件，讓警憲進學校來搜查。我要是做錯了，我個人負責。我對我的同事負責，特別是對西籍的教職員。因為用民主的眼光來看，今天你們會看見看不慣的事情。我做中國人，只有慚愧。召集學生，也由我個人負責。你們要守紀律，有話事後再說。林園長跟我約定的條件是這樣的：

（一）軍隊不開進學校，徒手的警憲可以進來三四十人（註：來的一共六十九人，我不得不拒絕了二十幾個人，請原諒）

（二）只查人。不查物件。（註：後來發現有人在宿舍翻着學生的書籍，不得不阻止他。）

（三）只查名單上的三十人，不查別人。凡是不關於本案件的人，不論有無嫌疑，今天絕不能讓帶走。關於這一點，我用自己的性命來擔保。

（四）學校絕不會同警憲來搜查學生。警憲要進來，其勢我們不能攔阻他們。我可以把學校的地圖借給他們，派校警領路。其餘一切，全都由警憲負責。中西教職員，要是有不放心的，你們可以跟在後面觀察觀察，將來有個見證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們去，你們自己負責。（註：學生自治會要求我讓他們派人監視；我拒絕了。）

我知道警憲一定會遵守這些條件的。現在請在場的中西教職員一概退席。凡是在暑假畢業，秋季留校服務的學生，也可以退席。學生請不走動，讓警憲查看你們的身分證。

（註：林園長也說了幾句話，態度極可欽佩。學生態度謙和莊重。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問，搜查之後，包圍線是否立刻解除？林園長答應在十五分鐘之內，撤去軍警。後來校西門南門，果然立時解禁。東門延遲了兩小時。據我所知道的，林園長無法負責。）

先生自己的筆迹，下面寫着「近人句」三個字，到八十月三日朱先生火葬之後，我從城外廣濟寺靈前回到清華，陪朱先生的兩個公子回到朱先生的寓所，看見朱先生的帽和手杖還掛在過道的牆上，我只疑心朱先生仍未離開他的書房，走進書房，我又看見朱先生書案上那兩句題詞：

「但得夕陽無限好，
何須惆悵近黃昏。」

從這兩句詩，也約略可以窺見朱先生近年來的心境。假如人生五十也可以算作夕陽西下的話，朱先生的夕陽晚景真可謂「無限好」，然而誰又想得到，黃昏倏爾而逝，突然降臨的黑夜就把一切給掩沒了！

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深夜，清華園。

附朱自清先生著作目錄

一、蹤跡（十三年十二月亞東版）二、背影（十七年十月開明版）三、歐遊雜記（二十三年九月開明版）四、你我（二十五年商務版）五、倫敦雜記（三十二年四月開明版）六、經典常談（三十五年五月文光書店版）七、詩言志辨（三十六年八月開明版）八、新詩雜話（三十六年十二月作家書屋版）九、標準與尺度（三十七年四月文光書店版）十、語文零拾（三十七年五月名山書局版）十一、論雅俗共賞（三十七年五月觀察社版）（與葉紹鈞先生合著三種）十二、精讀指導舉隅（三十一年三月商務版）十三、略讀指導舉隅（三十二年一月商務版）十四、國文教學（三十四年四月開明版）十五、語文影（尚未出版者一種）

改用金圓券訂閱辦法

茅盾等主編

小說月刊

零售每期 一元
訂閱三期 二元五角
訂閱六期 四元五角

（該辦法由即日起實行）

·歡迎國內讀者直接訂閱
·優待國內同行直接現批·

訂購處：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 前進書局

北平大拘捕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因「七五」血案所引起的「七九」大請願，叫出了「槍斃傅作義」的口號，表現了東北華北同學堅強的團結。當局不能不感到可怕，於是官方一再宣稱「七五」單純，「七九」變質，盡力拆散東北華北同學的團結，又揚言要追究「七九」責任，給華北同學以威嚇。官方報紙更叫囂「清除學匪」，說學運是「共匪」的第二戰場，製造一種恐怖的氣氛。適應着這迫害的信號，各院校同學一致提出：「提高警惕，加強團結」，東北同學并反駁：「七九」跟「七五」一樣的單純，有「七五」才有「七九」。這種分化算是失敗了。

當局的策略有了個小小的轉變。長白師範學院在「七五」血案中，因爲死傷的人太多，所以表現得更憤慨，更堅強，因而迫害在他們身上開始。八月四日，白師院長訓話後，校內特務故意互相扭打，校外警憲便藉此入校按黑名單逮去十五個同學，旋即移送特刑庭。北平地院也在這幾天傳訊東大等校四同學。這樣，東北學生彷彿沒有問題了，目標就移到華北各院校，而且以全力對付。

仍然是從神經戰着手。八月十日，北大發現海報，說是當局要逮捕五百餘同學，名單已經擬就。同日，清華燕京接到恐嚇信。謠言紛紛，人心惶惶。十二日，陳雪屏悄然來平，化名住在北京飯店。以前陳氏來平後，總是表現一種開明的姿態，公開表示願與青年赤誠相談，這一次可變了，只聽得說他與這個密談，那個密談，北大同學去找他時，却始終找不着，連住處都無法問明。跟他來的，據說還有毛人鳳，更是神祕萬分。同學們可以探聽的只有校方了。北大同學頻頻謁見校長胡適和賀麟訓導長，胡賀兩個人的態度也有些不可捉摸。胡說學校也沒有保障，能夠保障的只有同學自己的行動，又說同學的行動與自己負責，當局是會追究「七九」責任的。外面的風聲也越來越緊，「入校搜捕」的傳說更熾。十八日，行政院「清除後方匪諜辦法」公佈了，入校搜捕也成爲「合法」的行動，更表示了當局的決心。恰好第二天正是「八一九」，瀋陽各界說要爲「七五」遊行，北平當局宣佈十八晚九時開始戒嚴，有人以爲這是對付瀋陽事件的，因爲「八一一」有過同樣的情形。但是，這推測錯了，當晚北大當局的態度有些異樣，據鄭天挺秘書長說：校方盡力拒絕搜查，但對拘傳的事情希望當局採取合法的手續，根據基本的法律。顯然，校當局已有所恐。八月十九晨，各報都登出「特刑庭拘傳職業學生」的名單，共二百四十八名，大家都驚訝。各院校的包圍更緊，同學出入都須驗學生證，對黑名單；城內城外的交通也告斷絕。但是，軍警還沒有衝入校內，這一天校內還自由，師院和北大都開過羣衆會商討對策，都認爲特刑庭是違憲違法的，根本無權拘傳人民，同時「危害國家」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因此堅決拒絕這種拘傳，北大并成立了安全保障委員會。校當局方面，師院袁院長表示絕對不許入校搜查，藝專徐校長表示願保障同學之安全，北大訓導長說校方很關切這事，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並謂相信軍警是不會進來的。北大、師院的教授並發動簽名抗議。不過，有些院校存心與學生對立，中國大學總務長竟將被拘傳學生送給校門外的警察，輔仁鐵院接受檢查，軍警在校內逮捕學生。由於這些原因，第一天被捕者達三十餘人，有些是黑名單以外的。二十日上午，第二批名單又公佈了，一共七十四人，其中包括各校大部分理事，清華理事只一人未上黑名單。拘傳教授的傳說也起了，據傳北大有十二教授已列入名單，清華燕京有六個，而且都說得有名有姓。但是，另一個傳說又說明拘傳教授還沒成熟，因爲當局這次的策略，是竭力採取分化政策，北平的名單公佈後，當局就曾說過其中沒一個是教職員；而且事實上連一個東北同學也沒有。不論怎樣，情勢是越來越嚴重，大家揣測一定還有第三批名單，有的說，第三批名單將不公佈，實行祕密逮捕。事實上，未在名單上而被捕者日多，各校的包圍也更緊；隨時有被衝入的可能。另一面，教授們的憤慨也更深，北大師院教授發表了抗議宣言，聲言政府根據不合理的法令來迫害學生是違法的，他們「也只覺得政府目的只在製造事件」。北大五十餘教授，更上書胡校長，提出四點意見：（一）特刑庭之設立，根本違反憲法，學生如有犯罪證據，應由法院傳訊；（二）第二批名單中之學生，果曾犯罪，爲何不於先一日第一批同時傳訊，且其中所列學生多爲自治會理事，豈自治會理事即爲「匪諜」耶？故請校方拒絕接受第二批名單；（三）爲維護學府尊嚴，請阻止軍警入校搜查，逮捕學生；（四）請向當局要求，立即撤消監視包圍學校之軍警。有一個教授說：「我只有一個意見，請胡校長出來問行政院還要不要辦教育，政府如要這樣做，胡校長就提出辭職好了。」當年蔡元培先生曾這樣做過。二十日晚，朝陽訓導員李貴民帶鎗憲警入校搜捕同學。二十一日下午，師院、燕京同被軍警搜查。搜查前，陸志韋先生有過一篇最沉痛的演說。（編者按，已見陸先生專文）二十二日，清華也遭受了檢查，梅貽琦校長也提出了一些條件，但據說並未遵守，許諾多被翻亂。在這狂風暴[illegible]北大也是驚險萬分。二十一日下午是最緊急的關頭，大字報到處張貼着：「今晚可能被檢查」……「保衛北大」、「向胡校長請願去」的海報立即貼遍民主牆。安保會的負責人四出找胡校長、賀訓導長、鄭祕書長都找不到，而外面的卡車越來越多。晚飯後，大家都齊集孑民堂前商討對策；當場決定決集中紅樓居住，堅持絕對拒絕拘傳和搜查，實施「一人被捕，全體坐牢」。七時半，全部開入紅樓，集中二樓，用講桌堵住一切通道。一面派人守望，一面開會商決自治會工作繼續問題。大家都有作長期居住的打算，晚上蚊子多，誰也無怨言。九點多，賀訓導長來了，說保證今晚不會衝進來。不久軍警撤去，還算安然無事。二十二日晚，校方忽然佈告限被傳同學四十八人於二十三日下午三時以前到訓導處報到，然後將由訓導處護赴特刑庭投案，否則即停止學籍。同學聞訊，大爲不滿。十三日下午，又開羣衆會，派代表向胡校長要求收回成命，並決定自當日起繼續集中紅樓，都聲言無論如何要守住這最後堡壘，絕對不許入校搜查。到晚飯後，校方一再保證軍警決不會進來，同學信任校方，集中動議暫時打消。同時，據校方透露，這佈告是一種姿態，校方決不與同學爲難，而且停止學籍與開除學籍不同，爲了應付軍警當局不得不這樣作，因爲這樣表示，並由胡校長寫封信說明這些同學已不在校，軍警就不致入校搜查了。事實也正是這樣進行的。二十四日上午，包圍紅樓的警憲增加，西校門許進不許出，大有檢查的模樣。緊張中，周炳琳院長來了，說同學再忍耐些時候就可解圍了，進留在門口任維持。十時一刻，警備部汪處長，憲兵團梅團長等三人帶三個隨從來看胡校長，談了一會，由賀訓導長帶領到民主廣場和紅樓巡視了不到十分鐘。十時三刻，三官員乘着汽車歸去，官樣文章也就交卷，門口軍警全部撤走，北大總算免於檢查。現在，北平好像又恢復了常態。但還是表面的。總的來說以後將隨時入校逮捕，同學們誓當死反對特刑庭和行政院八月十七日的命令，認爲這部是違憲違法的。這只是一個鬥爭的開始。（八月廿六日）

南京大拘捕

嚴冬

（觀察南京通信）「在成年被學潮糾纏得頭惱不堪的政府官員們看來，暑假七八兩個月的大致風平浪靜，是最令人寬慰而輕鬆的。特別是今年暑假，經過四、五、六三個月連續的學潮風險浪之後，尤其顯得平靜，除了北平偶然發生了一次『七五事件』外，一般的說，幾乎會興起寂寞之感」。這是八月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的記載，但同日該報的社論卻說：「這種安靜是表面的，而且是暫時的。在這表面和暫時的安靜背後，正醞釀着巨大的狂風暴雨」。

「巨大的狂風暴雨」真的終於來了，八月十八日行政院對各地行政機關頒發了一道所謂「戡亂，安定後方秩序」的命令，同時中央社發表了長約萬餘言的「共匪間諜策動學生製造學潮之鐵證」，中央日報著論大聲疾呼「肅清共匪間諜」，其言又曰：「在暑假期間，共黨職業間諜學生，正在力從事組織部署，準備於秋季以各大學行動。在北方，彼等以某某二三大學為據點，組織半武裝性質之聯防，着重於困擾傅作義將軍，分散其注意力，使之腹背受敵。在京滬一帶，製造事件，或流血慘案，藉引起國際不良之觀感，阻止美援。在內地，建立蘇維埃據點，聯接共黨匪徒之軍事攻勢，必要時轉變而為發動後方暴動之中心」。該報認為「清除潛伏於社會上各業各區的共匪間諜，問題比較單純，進行亦比較易於着手。然而根據過去經驗，清除潛伏於學校中之共匪職業學生，則問題比較複雜，進行比較棘手」。行政院於通令各地肅清匪諜份子後，首都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已發出傳票一百四十七份，並拘訊「潛伏京市社會各階層及潛伏各學校之匪諜趙之瑛等一百七十九人」。

繼在立院激辯中統局應該屬於司法行政部抑或歸屬內政部警察總署之後，國防部保密局就已經傳出了全國各地將要同時大捕學生的消息。國民黨青年部所調查的黑名單，老早已經送到衛戍總司令部去了，中統局和保密局每天開會商，討論一些捕人的技術問題。

據說在八月十七日的上午，首都衛戍總司令召集了憲兵司令部和警察總署等機關的主管人開會，在這個會上，決定了在南京的兩百多個大中學校學生的命運。為了先傳後拘還是乾脆不用發出傳票就直接捕人的問題，他們曾花很多的時間推敲。因為昆明已經有過學生聚在一起拒捕的經驗，他們最後決定了在原則上先傳後拘，同時進行秘密逮捕的雙管齊下的辦法，並且決定在捕人之前，先公佈被捕人的名單。這個辦法，在他們看來有兩點效果：第一，表示他們是在依法行事，使大多數黑名單上沒有名字的學生用不着害怕，因而深衆拒捕，將榜上有名的學生孤立起來，讓他們名正言順地去傳去捕。第二，實際上，不管是公佈了姓名的學生要被捕，就是沒有公佈姓名的學生和各階層的人民也同樣可以逮捕，公佈了姓名的固然跑不掉，因為早在公佈姓名之前就被監視住了，沒有公佈姓名的同樣也跑不掉，因為他們也同樣被監視着。

這種半公開的大規模的逮捕，是從八月十七日下午開始的。掛短槍的特務人物，在當天下午趕包圍了中大、金大、劇專、語專、藥專、音樂學院等校。中大某同學在成賢街被架走了，某校同學搭一路江南汽車由山西路向新街口時，也被架走，公共汽車為此停駛二分鐘。當天晚上，中大一共逮捕了二十七位同學。

在大逮捕的羅網下，政府利刃特別指向中大。十八日下午，該校接到了特種刑庭的傳票，被傳的一共是九十二位同學。整個白天和晚上，中大被恐怖的氣氛籠罩着，被戴上「職業學生」帽子的同學，馬上就受到另一批職業學生的監視，行動完全失去自由，校外的特務人員也進校內來了，擠眉眨眼地從宿舍搜到圖書館，從大禮堂搜到大操場，甚至女廁所和他們認為可以藏人的牆壁角落裏，每一塊地方都沒有逃過他們的視線。八月十九日是最可怕的一天，當着很多人的面前，一個已經向中大訓導處聲明明天準時到庭的同學，在衆目睽睽之下，被兩支手槍對着背脊帶走了。另外一位同學，則因為他在院場晾曬收了一件自己洗的衣服回宿舍，也被一個特務帶走，「你想收拾行李逃走嗎？」說着就用槍筒在那位同學的腰部猛力戳了幾下。其他的，如哲學系三六級學生史霞華、經濟系三六級學生黃善初二人，上午十一時分別在碑亭巷珠江路口被人架走；歷史系四年級女生袁旭霞，下午一時在文昌橋宿舍門口小竹林餐室用飯時，被人架上吉普車而去；機械系趙世愚、航空系李之緻二人，亦在珠江路口被拘，先入東區警局，旋解送衛戍部。

金大方面，接得特刑庭傳票三張，包括了吳玉美、楊錦湖等十二個人的名字，這一消息傳來，該校立刻充滿了緊張的空氣，大家鎖着眉尖，交頭接耳，不知將有什麼樣的災禍降臨。據該校「後援快報消息」：王軾鈞在十八日下午二時，由家返校途中被捕，梁孟賢在十九日下午六時半，於西樓餐廳門口，被人架走。金大暑期留校學生，獲悉十二人將被特刑庭傳訊後，曾在北大禮堂集會討論，並邀請范謙衷訓導長表示意見，他說：「特刑庭傳訊學生係政治問題，校方不能負責，但希望同學準時出庭。」第二天（二十日），該校召開緊急訓導會議，校長陳裕光，訓導長范謙衷及各院院長袁伯樵等十餘人均出席，決議案未公佈。

劇專被傳訊三人，祇殷桂翼在校，他是理論編制組四年級學生，去年曾任學生自治會主席。據該校同學說：「殷桂翼是十八日下午三時許接到傳票的，當即簽字蓋章收下，晚飯後，殷同學在校內散步，突告失蹤。」藥專被傳訊的計陳鑫等四人。邊疆學校學生榮慶仁一人被傳，於二十五日赴特刑庭報到。語專學生韋宿昇，住中山東路韋復慶電料行內，十九日被東區警局傳訊未歸，家屬頗為焦灼。音樂院被傳訊學生九人，祇葉傳瀚等六人在校，於十九日上午十時，乘[illegible]派往之專車，由[illegible]導長王潔吾率領前往特刑庭報到應訊。關於檢察官問些什麼？據他們說：「沒有問什麼，是私人談話方式，先從我們的私生活（家庭生活）談起，再談到學校生活，問問學校的經濟來源及對現政府的看法，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我們因為都是學音樂的，對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所以都沒有關於政治問題的答案。」其中一位同學說：「檢察官問我對現政府的看法，我說：現在貪污舞弊這樣多，是叫人不滿意的。」

截至八月二十五日為止，連同自己到庭應訊的，中大一校已經被捕了六十多位同學，加上其他各校被傳被捕的同學，聽說已有百餘人。少部份被認為嫌疑較輕的，允許保釋候傳，被拘押在特刑庭的至少在七十人以上。

關於捕人的情形，「大學評論」有這樣的報導：「最初綁人總部在距學校較遠而靜僻的地方，後來漸漸移至鬧區，最後，『特工人員』們率性搬到學校的門口去『工作』。……被綁的學生多是一句話不問，架上吉普車就走，因此張三被誤為李四的也有，同姓不同名被綁的也有，等到這些錯誤被發覺時，被綁的人早已駭得『魂飛天外』，但亦無可如何。據說，被綁去的學生多數都送到孝陵衛。」（八月二十九日南京）

關中搶糧戰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太原威脅戰結束後，緊接着又上演了關中搶糧戰。八月七日，距離晉東會戰結束後的第三月最後一日，彭德懷又帶着一、二、三、四、六等五個縱隊，由黃龍山出來了，這五個縱隊雖經軍方宣稱已消滅了三分之二，經過三個月的整補，又復元了。在晉東之戰結束後，胡宗南將軍曾對京滬記者團表示過，三個月後共軍會再來，果然不出所料，又來了！

這次共軍發動太原的威脅戰，用的兵力相當大。原駐晉南的新八旅、十三縱都調到晉中去了，彭德懷的二、三兩縱隊由禹門東渡到晉南堵防，戰局重心在太原，胡宗南的大軍也不得不轉移一部份到別的戰場去。第卅師（原來守臨汾的部隊，指揮官魯崇義係西北軍孫連仲的舊部，戰鬥力很強）空運赴并，另外第×××師奉命由陝豫邊境出盧氏進擊豫西，負有收復洛陽的任務。這兩個師一調，陝境的防守力量當然空虛了。胡宗南看準了這一點，所以在共軍尚未發動攻勢前，先下手爲強，派了一個師進擊黃龍山區，並且收復了郃陽韓城兩據點。這一行動，只能解釋爲以攻爲守，因爲一個師的兵力決不可能肅清黃龍山。太原之圍尚未解除，正殺得難分難解之時，晉南的共軍二、三縱隊又悄悄地回到陝境，而且會合一、四縱隊，避開韓部地區的國軍，猛撲澄城北郊楊家因一帶國軍第卅六師的陣地。卅六師是隴東追擊戰中打得很出色的一支部隊，彭德懷很吃了他一點虧。這次冤家路狹又碰上了，共軍運用了優勢兵力，包圍了卅六師的兩個團，據官方發表「一個團於消滅三倍以上共匪後全部壯烈犧牲」。南京方面也承認國軍小有損失，比起宜川之役來，這次國軍的損失是不算太大。共軍消滅了澄城北郊的守軍後，指向澄城，城內的守軍爲了避免再被一吃一掉，未經大戰，自動撤離，收復郃陽，韓城的那一支國軍，陷於完全孤立狀態中，不得不向西南方向撤退。在陝南郿縣一帶整補訓練的前劉戡廿九軍的部隊，也抽到第一線。共軍佔了澄城後，並未積極南下，而從事於將糧食東運到晉南。雖然有一支隊伍向咸（陽）同（官）支綫攻擊，但也只是牽制國軍的兵力，使國軍不敢調離同官白水這一帶煤礦區。官方早判斷共軍一定會南下到關中平原來搶糧，所以政府也曾下令鄰近共區的各縣餘糧必須於收割後一月內搶運到後方來，由軍隊擔任護送。命令歸命令，事實歸事實，關中金黃的麥粒，終於引來共軍的攻擊。國軍雖然集結了兩個師左右的兵力向澄城反擊，可是共軍爲了掩護物資的東運，堅強地抗拒國軍的反攻，兩個多星期的時間，共軍可能已完成護運的行動，截止筆者屬稿時止，澄城尚未收復。日後澄城可能重歸國軍掌握，但麥粒已隨風而逝矣。這次關中之戰，僅僅是一種試探戰，或稱之爲物資戰亦可，因爲共軍沒有擴大襲擊的範圍，也沒有與國軍作正面的大戰，共軍主力又轉移到山區。

這次戰役直接引發的原因是關中防務空虛，更大的原因是因爲陝北共區今年荒歉特甚，共方在陝北普遍發動救災運動，他將晉南的糧食運來陝北濟荒。這些糧食，只有從關中取得補償，從晉南運糧到陝北，再從關中搶糧運晉南。這一轉運間，間接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成功。陝北的人民吃到共方發放的糧食，當然會感激；晉南人民看到共軍從陝西運回糧食，直覺上感覺到是減輕他們的負擔。

總統蒞陝後的若干決定，只有胡宗南出兵河南一項兌了現。補充兵源編馬家軍兌現了一部份，其他人事上的決定仍是懸案。張治中任西北軍政長官已是修改案，最重要的軍事指揮系統還沒有得一個決定。馬步芳的部隊駐屯地區也沒有解決。馬鴻逵所部仍在三邊，眼看着榆林可能成爲共軍的攻擊目標。現在榆林的防守部隊系統很複雜，有胡宗南的×個團，有陝西保安團，有馬鴻逵的騎兵系隊一部份。鄧寶珊雖名爲「晉陝綏邊區總司令」，可是只是一個光桿總司令，手中無一個基本將，無一支基本兵。鄧氏本人這次在西安逗留了很長的日子，結果得到胡宗南的同意，獲得指揮榆林各單位軍隊的權力，並解決了武器問題。至於糧食，要靠傅作義的幫忙了，因爲接濟榆林的糧食，只有依賴綏遠。

最近胡宗南派他的參謀長盛文（胡的智囊團領袖，曾任糧食部次長）到北平向傅作義請教總體戰的問題，這在胡將軍個人，是破天荒之舉，因爲打仗的事，胡將軍是很少向人求教的；尤其是打共產黨，胡將軍更是年資經驗俱足。現在反而向傅作義請教，這表示他能接受過去的教訓來集思廣益以戡亂。除此之外，另一重要任務據說是商討華北與西北軍事聯系上的問題，尤其是晉境的戰局與政局。卅師空運到太原後，胡將軍的指揮權已滲入華北，閻老將軍的地盤，傅作義不好意思去管，可又不能不管，現在由胡將軍代傅作義去管，在閻錫山面子上，較爲過得去。因爲閻胡之間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這一既成事實，胡傅之間當然應該有一交代。

董釗主陝，捨軍從政，由軍長而主席，在董氏看似乎是高升了一部，可是政治比軍事難搞，陝省府人事經過一個多月的折衝和暗鬥明爭，才發表。這一個多月中，董釗是精疲力竭，爲人事而傷腦筋。改組後的省政府，到底是不是比視任的好，待遇事實證明。不過董釗對此主席，實在是沒有大興趣。棄之不能，攬之不得，就任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稱病不來，由祕書長蔣堅忍代爲宣讀一篇對「改革幣制的感想」。草草終場。說來說去，今後陝局仍只有看胡宗南將軍一人來表演！（八月廿八日）

今日的韓國

最近出版新書

潘公昭著

每冊金圓券二元一角

韓國位於中美蘇三大強國之間，戰後南北兩部分別在美蘇佔領之下。中韓在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超過其他國家的密切關係。本書把韓國的自然環境，歷史沿革，民族生活，政治黨派，解放運動，社會現象，文化學術，作扼要而正確的介紹，要研究戰後新興之韓國者，不可不讀本書。卅二開本三百四十餘面。

今日的外蒙	潘公昭著	一元九角二分
滿宮殘照記	秦翰才著	一元〇八分
現代的美國	潘公昭著	二元一角六分
今日的印度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六分
今日的台灣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正
台灣見聞錄	周文德著	一元八角正

（金圓券）

中國科學公司發行

上海(18)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電話七四四八七

歡迎選購　歡迎批發

鄧錫侯遲不赴任的原因

（觀察成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六月裏，當鄧錫侯回到成都的那一天，在鳳凰山機場歡迎他的盛況，是王陵基在四月裏來川上任時的歡迎情形所不及的。他的僚屬們擺成了示威性的壯大的行列，向他鼓掌致敬，他在軍樂悠揚聲中步下飛機，就已經感動得「老淚盈眶」，這幅畫面，確是夠動人的。之後，他就身着微服，在黃昏的春熙路上，或柳暗花明的望江樓邊，「狀頹揹逸」的散起步來了。四川年年不斷的米潮、學潮、水災、僧命似的徵糧徵兵、以及永無止息的政治上的明爭暗鬥，逼得他丟掉省主席的寶座；然而如今，災荒依然，賦稅加重，他卻用不着再操心，而學生們也不會再向他遊行高喊：「打倒三雞公」了。

於是，他仍舊回到錦江之畔，做起百花潭的主人來。他返川後向蔣總統告了三個月假，便在那古竹參天，濃蔭蔽日的「康莊」內，穿上麻布大掛，搖扇迎風，沉思養痾，而沉湎於自彼岸青羊宮傳來的晨鐘暮鼓裏。

然而，一個浮沉於宦海中的人物，是永遠得不到安息的。政治上的驚濤駭浪，將永遠洶湧地縈繞着他。他三月裏飛京，旋去滬調養病，丟掉了省主席的頭銜，但換來的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的帽子，卻更為沉重。他從前的責任是「安川」，現在卻要他出川「綏匪」。鄧錫侯原也是以「圓滑」見稱的，他何嘗不知道前途的險惡，但為了保住本身的地位，為了他的部屬向他要飯碗，如果眼前是一付枷鎖，他也無法「滑脫」的。因此，鄧錫侯是鬱鬱的。

八月十日，在成都市政府，市參會等機關發動的「省垣各界歡迎鄧晉康先生榮任川陝甘綏靖主任大會」，原訂就在這天舉行，但結果突告流產。這個盛會的籌備已久，萬事俱備，連成都市的大百貨商店如寶元通，國貨公司都破例的捐了幾千萬元，共襄盛舉，似乎成都人對他這位卸任主席，已經很夠面子的了，但在八日報端突然刊出大會因鄧氏延期赴任而停止的消息。理由是：「據有關人士談稱：中央任命鄧氏為該署主任，用意在守備該土而肅清殘匪，但以遲未交撥兵力關係，以致鄧氏心有餘而感實力缺乏，深恐有負鄉人期望，將候中央兵力撥定後，方能定期赴任云云」。其實，這也是不足為奇的；王陵基及其省府要員，早在七月裏就曾經設宴「歡送」過他，作陪的還有代表中央「鎮守」成都的中央軍校校長關麟徵，席間大家都請鄧立赴漢中就任。七月廿五日，留蓉的國代立委及省參議員二百餘人，特為鄧舉行了茶會，也曾當面希望他「即期赴任，以副川省人民的期望」。但是，幾度「歡送」，「送」他不走，現又發動市民來「歡迎綏任」，但仍然也「迎」他不去。

鄧錫侯為什麼遲遲不肯赴漢中部署上任，表面上說是他的「病體倘未康復」，但他究竟害了什麼病？除了在一次百花潭的宴會上，他很堅決的推謝了客人的敬酒，滴酒不沾，一反以前的豪飲之外，再也看不出有什麼異狀。不過，在七月廿五日的茶會裏，卻公開吐露了他底「報國有心，殺敵無力」的隱衷。據第二天的報紙所透露：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的官銜是夠大的，所轄川省廿縣，陝西二十二縣，甘肅四縣。但談到實力，在鄧氏的心裏，就是一個隊伍，目前他僅有這一師人，據可靠消息：這一師人現有兵力為一團另兩營，其餘一團正在整訓中。從前鄧的希望，請調羅廣文部給他指揮，因羅的第十師訓處，部是徵調的川丁，以川民保四川，自然比較理想。殊不知羅所轄的三萬員兵，已於目前被胡宗南撥走一萬，方靖撥了五千，剩下的也不過是老弱殘兵而已，再就是羅黃兩部的械彈，也都破舊不堪了。

鄧在那次茶會上，也就對當時局勢公開表示：「目前我若共匪竄川不外第一由白河安康一線入川，第二則由寶鷄南下，決不會再走通南巴公路。目前彭德懷雖有五六萬人在陝北，但胡宗南大軍尚有十餘萬人駐陝，決可防堵。目前所需要是請求中央整補羅廣文黃隱兩部的實力，為適應總體戰，在邊區綏區內，本人當盡力治理，惟先決條件，要有充實的武力。」至於王陵基，當他登上了川主席寶座以後，就把「拒匪於川外」的擔子，完全推在鄧錫侯頭上。在那次茶會上，王陵基也由衷致詞：「當康省主席劉文輝在蓉時，本人與鄧先生二人皆曾幾度會談，當時本人卻強調鄧先生應負禦匪境外的責任，前天與鄧先生對談本人也說過，邊署所轄在川者甘縣，若鄧先生為適應總體戰，本人願意鄧先生幫我治理。」對於四川他則強調說：「中央一向是重視四川，四川以前是抗戰根據地，目前是剿匪根據地，以後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根據地。」

關於鄧王劉三人會談的內幕，外面傳說很多；據說有一次鄧錫侯請了王陵基，劉文輝二人吃飯，鄧在席間曾向王劉二人傾吐由衷之言，略謂川康軍人在抗戰中，把自已經營的軍隊，地盤都供獻給中央了，但當他此次辭去省主席之後，在京滬一帶卻備受冷眼，令他為之洩氣。如今共匪竄川日急，綏署之職，責大權小，有名無實，一旦失職，被俘陣亡撤職槍斃是不堪想像的。故要求王劉二人與他通力合作，以求川康自保，否則他就不赴漢中就任。當時，聞劉文輝頗有所感，而王陵基正在走紅運，似乎「無動於中」。如果說鄧錫侯是因為辦理四川征兵征糧不力而下台，則王陵基上台即是中央的要四川加緊征兵征糧的強力表現。七月間召開的省參議會，因本年度中央[illegible]省[illegible]征借稻穀數額，共計一千八百萬石，已佔全國征借穀數三分之一，一部份地方議員，曾經力反對。同時，因寶鷄失守，川防緊急，於是有人提出停止征兵征糧，高喊「川人自保」的口號，一時引起軒然大波。據七月十六日中央軍校主辦的黃埔日報所載：「王主席見情勢不妙，急忙起立說我希望諸位冷靜一點，並且我提醒諸位注意，我握有情報，香港李濟深派有張某到川省找尾巴，現在張某走了，我留有黑名單。」王陵基語一說，議員們就嚇得不敢再開腔了。當日的黃埔日報，并以「警告地方主義」為題的短評，公開的以「中央」的姿態對「地方主義」大加抨擊。但是，地方主義究竟指誰，李濟琛找到了那條「尾巴」？想來只有王本人才明白。不過，川康軍人，尤其是以鄧錫侯為首的川康軍人的徬徨苦悶確是難以隱諱的。

尤其是七月間襄樊被陷，守將康澤，郭勳祺相繼陣亡失蹤的影響最大，川中軍政界莫不有人人自危之感。按康郭二人，都是川中將領，康是黃埔出身，郭是劉湘部下的師長，噩耗傳來，川省及渝市參議會均曾起立默哀。鄧錫侯更不寒而慄，[illegible]……把兵力都調到第一線去了。[illegible]

（下接第二十頁）

何其芳的轉變

何其芳的轉變

沈宗澂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現實生活無形中就決定了作品的內容，而作品的內容又影響到作品的形式，成功的文學作品沒有不是從作者自己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一個過慣優裕生活，從來不懂得貧窮的人，決不會歌詠勞動飢渴；終身流離顛沛的人，筆下也不會有歌舞閒逸出現。對於生活中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根本便不易了解，假若硬要憑想像強寫出來，寫出的東西一定是浮泛的。所以非得生活中有些什麼，才能寫些什麼；生活改變了，寫作一定會自然的跟隨着改變。若干年來的民族解放戰爭使這個時代進入空前嚴重的階段，每一個人都受到現實的苦難。文學家比一般人更爲敏感，當現實的鞭子打來，首先打醒了他們的幻夢，於是他們的生活開始改變了；於是我們看到當代的文學家一個一個的不再如過去一樣，在他們孤獨的扃閉中雕琢着身邊瑣事，抒寫着個人傷感的遭遇，而慢慢的走出了他們的斗室，發現了自己以外還有如此廣大的人民，幻想以外還有血淋淋的世界；於是他們的抒寫有了具體的對象，開始反映着這個新的生活了。這個大轉變是從個人到羣衆，從傷感到憤怒。何其芳過去曾是極端的抒寫個人的詩人，或者散文家，現在却成了最能徹底走向羣衆的一個。但何其芳的轉變比一般人來得艱難，因爲他是在封建型的古老的大家庭裏長大的，深受過舊社會制度毒害的青年。從舊社會到新社會，中間並不是沒有相通的道路，但這個距離太大了。並且何其芳作了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的代表，從過去跨越現在而大步邁向未來，走上了知識份子應該走的路。

他最早的詩收在「漢園集」裏，最早的散文收在「畫夢錄」裏，另一部份詩文收在「刻意集」裏，以後陸續出版的詩集有「預言」，「夜歌」；文集有「還鄉日記」和「星火集」。從「畫夢錄」到「星火集」，前後的寫法迥然不同，不但我們奇怪「畫夢錄」的作者能寫出「星火集」的文章，就是作者自己，對於這個事實也不無惶惑，覺得應該解釋一下。由華北戰場回到延安，他寫了一篇文章，解釋自己的轉變。他說雖然在這裏也碰見很多很多他那樣的知識青年，他和他們一樣的忙着工作和學習，但是需要特別解釋自己一下，因爲曾經寫過「畫夢錄」。（星火集九七頁）他從許多早年遇到的小事情上找到轉變的源頭，新思想就在這些小事情上開始萌芽。

一天，走過北平一條街，一個十二三歲的賣報的小孩用可憐的聲音叫賣着，這聲音感動了他。他想到這小孩和家裏的小弟弟一樣的年幼，爲什麼却在街頭求乞似的叫喚着；他想到人類不應該這樣自私自利，不能因爲這小孩不是自己的弟弟，便毫不難過的走了過去。他拿出一塊錢，買了一份報。他又遭過一段不幸的愛情，發現了不幸的根源是社會太不合理，在不合理的社會裏難以有圓滿的愛情。大學畢業後，到天津一個中學裏去教書，早晨看着闊人的子弟坐汽車來上學，黃昏看着遠遠的煙囪，放工回家的女工沿着都市中流出來的污水走過，他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罪惡。五二八學生運動中，學生們熱烈的開着會，呼着口號，那熱情像燃燒着的火光，照亮了他生活的陰暗。在山東萊陽，看見無數人輾轉於飢餓死亡之中，他忘記了個人的哀樂。一些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帶着農具從鄰縣趕來作收穫時的零工，晚上露宿在石橋上。冬天，他到了青島，一排一排的別墅都空着，鎖着，他明顯的感到這個對比所代表的意義。他的新思想於是成熟了，清楚的感到必須放棄個人主義，走向人羣，走向鬥爭，運用文字成爲武器，將低徊隱忍變成火辣辣的反抗的鞭箠。抗戰起來了，他決心回到四川的家鄉去作啓蒙工作，但那裏在軍閥官僚的統治下，思想文化落後得使他不能順利的展開工作，他決定離開，因爲他還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撫慰。他到了成都，教點書，寫些雜文，而且發行了一個小型刊物。他的文章抨擊當地濃厚的封建空氣與歧視婦女和虐待兒童的封建思想，以及知識份子向上爬的人生觀。但是他並沒有找到同情他的伙伴，這又使他感到寂寞和悲哀。他開始走向一個新環境，找到快樂和光明，正如他那「一個平常的故事」告訴我們的：「在這裏，當我帶着熱情和夢想談說着人類和未來，再也不會有人暗暗的嘲笑。在這裏，我這個思想遲鈍而感情脆弱的人從環境，從人，從工作學習了許多許多，有了從來不曾有過的迅速的進步，完全告別了我過去的那種不健康，不快樂的思想，而且像一個小齒輪在一個巨大的機械裏和其他無數的齒輪一樣快活的規律的旋轉着，旋轉着，我已經消失在它們裏面。」（星火集二〇頁）

這種解釋是還嫌粗淺的，現在若干已經日趨末流的文人，未嘗不時時遇到這類沖激，却不見到有所感觸，更不見得因此而起來改造自己。這只是偶然的原因，不是必然的原因；只是原因的部分，不是原因的全體。僅僅是一點感觸似乎並不足促成何其芳的轉變，一定還有另外一些理由潛存於事實的背後。

在「星火集」裏，作者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他投身實際戰鬥完全由於一種寫作上的企圖——寫報告文學的企圖。他說：「是的，我應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我應該到前線去，即使我不能拿着武器和兵士們站在一起射擊敵人，我也應該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一〇九頁）又說：「成了這樣一個打了敗仗的個人主義的散兵游勇，我才想到去投奔一枝苦戰了十餘年的大軍。這決心還帶着一種寫作上的企圖。我當時打算專心寫報告。」（二〇〇頁）這種企圖同時也就是推他轉變的一個巨大的動力，使他不得不放棄個人主義的辯護，向着羣衆走去。

何其芳的文體是獨特的。新文學運動打倒了舊有的文體，新的却未能馬上建立，各人摸索着各人的道路，各人試驗着各人的技巧，或者移植外國的寫作方法，或者在陳舊中發掘新的材料。何其芳就在這個蕪雜的場面中樹起了他獨特的旗幟。「畫夢錄」雖然只是十六篇短文，八十多頁的小書，却風靡一時，成爲當時散文的經典。獨特的文體奠定了他一時的成功，也正困惑了他以後的發展。

「畫夢錄」裏的文章完全是作者雕飾幻想的東西，幾乎沒有一篇是客觀的，像「夢後」、「獨語」、「哀歌」這些題目本身就是虛無飄渺的帶着夢幻的色彩。其中也寫到一些外界的景物，但這些景物當被作者的幻想附麗以後便現出了奇異的色彩，並不是一般人眼中所能看到的形象；其中也描寫着一些簡短的故事，但這些故事乃是爲了解釋自己，是給自己製造的玩具，我們看不出這些故事對於別人還有着什麼意義。這種文章是極端的向着作者內心發展的。何其芳的散文之路，無疑的，太窄狹了，以至使他走進了牛犄角。在他寫作的過程中，這種文體對於他所產現出的阻力，第一是筆下凝澀，其次是題材貧隘，最後終於寫不出來了。

「刻意集」中有兩篇東西解釋他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後話」和「夢中道路」。在「夢中道路」裏他說：「我喜歡那種錘鍊，那種彩色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我喜歡讀一些唐人的絕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揮手，縱然表達着意思，但我欣賞的却是姿態。」他極力的追求顏色，精緻

和美感，甚至連意義都可不要。結果墮入了文字的魔障：「我自己的寫作也帶有這種傾向。我不是從一個概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體，浮現在我心靈裏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些圖案」。「用我們這種簡單的拙笨的口語去表現那些顏色，那些圖案，眞費了我不少苦澀的推敲。我從陳舊的詩文選擇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燒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聯想的典故」。因此他的文章在用字方面便有了嚴格的選擇作用，不美感的字句，不美感的情調都不能寫入詩文。他說他曾在書籍中尋找着文字的彩色、圖案、典故的組織，像找尋着適合口味的食物。（夢中道路）不合口味的東西是不能消化的，但適合口味的食物未免太少了。何其芳初期的散文中，幾乎沒有一星辭藻不是經過苦心選擇而來的，沒有一個語句不是經過多番鍾鍊而成的。每一個字句都不是隨隨便便掇拾可得，於是他的寫作不得不矜持，他自己也深感寫作的艱苦和遲緩。寫一篇兩三千字的抒情文章要花費兩三天的苦心經營，薄薄一小本的「畫夢錄」竟用了兩年多的時光才雕琢完成。

思路苦澀和筆下遲緩究竟還不是滯塞停頓，僅僅時間問題，還不是影響寫作進行的致命傷。我們古代曾有過用十年，十二年寫一篇賦的文人，含筆腐毫才寫出來的文章，他們的寫作卻始終能繼續下去，然而何其芳竟由遲緩而枯窘而漸漸的寫不出來了。他的詩，寫了「燕泥集」後便沉默了整整一年，幾乎忘掉了詩。他說他的散文也僅有薄薄一小本「畫夢錄」。他開始苦悶了。他好像從盛夏走入一個荒涼的季節，好像被論調的亞當失掉了樂園。（夢中道路）題材的貧竭，不能說不由於他文章內向的發展，寫作的對象僅限於內心的事物，一點回憶，一點幻想，或者一點幽暗的感情。內心的東西總是極有限的，受個人經驗的限制，也受想像能力的限制。向內的程度愈深，可寫的對象愈少，不像外界的事物，是有形形色色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文章一旦寫向內心，有限的對象一天比一天減少，終於有寫完的一日。何其芳的文章充分說明了這個事實。窄狹之態的尖銳化，逼迫他不能不轉變一個方向，另找出路，如果他還有「寫作的企圖」。

同時，文學是富於社會性的東西，它必須從人羣中來，有人羣去接受，假如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便不會有文學產生，因之一個文學作品必須要求能夠為人所了解，為多數人所了解。一個作者總是極力想法把他的作品發表出來，不一定要博得讀者們的喝采，只要有些人去讀，而且讀了能懂，他就覺得十分滿意了。文學作品之所以為人了解，必得有它能夠為人了解的條件：最要緊的，它不得違背作者的情緒，因為它是作者情緒的產物；同時不得違背讀者的情緒，因為它更需要引起讀者的共鳴；作者與讀者情緒的一致是傳達文章的橋樑。這樣，作者便不能為了追求高深而失去普遍，為了抒寫個人而忽略羣衆和時代精神。然而何其芳早年的生活是完全和羣衆隔離的，初期的作品是缺少普遍性的。他幼年的環境便是一個病態的環境，寂寞的童年養成他種種不健康的習慣，尤其是愛好孤獨。學校生活對於他也仍然是孤獨的，他不曾向同年歲相同的孩子們展開過友誼。直到大學，才開始和兩個同學，也許只和兩個同學，時常往來，這兩個同學就是影響他以後從事寫作生涯的李廣田和卞之琳。他曾追述當時的生活道：「我的名字雖然排在有兩千餘人的名冊裏，我的生活一直像一個遼離陸地的孤島，與人隔絕。而且這就是使我偶然寫起散文來的原因。」（還鄉日記三頁）太寂寞的日子，太孤獨的生活，終是難以忍受的，於是他找到了排遣的方法，讀書和幻夢，書和夢代替了他所缺少的同伴。他說當時他接觸得最多最親密的並不是活的人類而是帶着死亡的芬香的書籍。（刻意集序）又說他來到北平以後，住在破舊的會館，冷僻的古廟和小公寓裏，成天夢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刻意集序）他描畫下那些白日夢便是「畫夢錄」。

十幾年前的社會還是一個不太健康的社會，一羣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他們也是喜歡憂鬱的，生活在幻夢中的，當他們讀到了帶着憂鬱色彩的刻畫夢幻的東西，引起了深深的同感，同情，以至於讚嘆。但是戰爭起來以後，我們的社會加速的蛻變了，健康的有生命的社會在苦難中成長起來，舊日封建的遺留，臨近了末日。中產階級在巨濤洪流的捲蕩中開始兩極化。新社會選擇了熱情的生活在人羣中的人們，淘汰了相反的人們；走向光明的得到新生，走向黑暗的漸漸趨於死亡；頹廢的作夢的人一天天的減少，進步的健康的人一天天多起來。而何其芳的文章是只可使有着憂鬱病的喜愛孤獨的人在幽暗的角落去低吟，對於一個心身健康，企望着未來，向光明邁進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懂得。巨大的轉變中何其芳失去了所有的讀者。為了「寫作的企圖」，他不能不放棄過去，捉住現在，而且向着未來。

以上雙重矛盾——作者內在的矛盾，作者與讀者間的矛盾，是造成何其芳轉變的主要成份。也正如他自己的解釋，他的思想的變化大約是和這兩個矛盾同時出現的，不過起初是徐緩的，幾乎是無形的，而在一次突然的劇變中解決了所有的矛盾。「還鄉日記」否定了「畫夢錄」，「星火集」否定了「還鄉日記」，一九四二年整風學習以後，「星火集」第四輯裏的文藝理論又否定了前三輯的雜文報告和散文，不到十年間，何其芳不停的進步着。我們希望他的路是沒有盡頭的，帶領着這一代的青年走向一個不盡的長途。

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

鄧錫侯遲不赴任的原因

（上接第十八頁）

員致蔣總統翁院長，爲加強川防，請求中央作有効措施的急電，其中包括補充鄧部，民衆組訓，征丁，征糧等項。第一項的原電內稱：「中樞旣已任命鄧錫侯爲川陝甘邊區綏署主任，坐鎮漢中，爲四川把守西北門戶，可謂知人善任，除由會面請加意調據，早日康復赴任外，惟查該署防線千餘里，所轄部隊，儘黃隱一師，且該師揚派，早巳奉調陝西剿匪，傷亡過半，迄今獨未補充，謝祇除一團担任成都警備勤務外，一團駐防廣元，尙未領到武器，擬請鈞座先生防知國防部，迅速配發該師武器，增強戰鬥力釐，并總將七十九師及羅廣文部隊撥歸指揮，俾有適當兵力，統籌防粲。至於總體戰之體制，尤宜及早實施，因該署所轄區域，地跨三省，行政各別，不如此不足以節度軍民達成任務。」

電是拍出去了，但不到兩天，川東門戶的宜昌又告吃緊，同時傳來川境的正規軍巳大批外調的消息。十一日的省參會駐委會，爲推派代表赴京請願，在川防方案中臨時動議：（一）加強宜昌守衞，應派大員坐鎮，但不得把川東守軍往外調。（二）加強地方部隊防粲力量，留川粲匪。（三）請將三十九師黃隊三派儘速補充，調往陝南者應調四川。（四）羅廣文部應給予番號指定防地。

四川的「牌」是攤出來了，但是中央的「牌」呢？仍未翻開。不過據此間人士的揣測：在目前，中央本身似巳自顧不暇，烽火撩天，戰緣延長，防不勝防，不到致命關頭，也就不會特別加惠四川的。四川向中央要求派兵來川，與增撥防務工程經費，一切都巳落空。但中央向四川徵實徵借的一千八百萬石，却一石也不許削減。亟於任命鄧錫侯主川陝甘綏署，多少帶有「因人設位」的意味，文何必昇予寶擴，也許在胡宗南的「第一線」崩潰之後，鄧錫侯才會蒙受靑睞。

總之，鄧錫侯的憂鬱是深沉的，他在川省政治舞台的外境是難堪的，永遠惜懸內戰的老百姓對於他一個人的得失是漠不關心的。雖然他還是如此「哀傷」而又「壯烈」的表示過：「萬一到了眞正危急的那一天，我在諸位先生熱切的愛戴之下，還是一定要上陣的。對於陣亡，被俘，或中央以不力之罪而處以鎗決，也在所不願：：」這「悲劇」性的豪語，却給人以「喜劇」性的觀感，那就是：時俟到了，他還是要像一個及笄的少女一樣，不管她如何醜觀，不管嫁過去是死是活，仍然要被人拉拉扯扯推上花轎的。

秋天來了，秦嶺上的風雲，只有一天一天劇烈。對於他那鬱悶不樂的病體，闊中的氣候，恐怕不會再有這「天府之國」的錦官城那般宜人了吧。

（八月十二日寄自成都）